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少年哲学向导丛书

解开社会之谜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述要



解开社会之谜
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述要

导言

在古希腊一座神庙的墙壁上镌刻着一句箴言：“认识你自己。”

人是社会的人，是靠社会关系维系才能生活的社会存在物。“认识你自己”的核心内容，是认识人所赖以生存的社会。

“认识你自己”的提出，标志着人类的觉醒，标志着人类已从蒙昧状态中摆脱出来，要对自己生存的环境和条件、对自己及其须臾不可脱离的社会探个究竟。

几千年后人们发现，虽然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从事研究社会历史的人越来越多，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研究的层次越来越深，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社会是怎样起源的？社会结构是怎样的？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社会意识和存在之间是什么关系？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本身究竟怎样，他在社会历史中有什么作用？应以什么态度、什么尺度评判社会现象和衡量社会进步？这些问题与其说澄清了，不如说更令人困惑、更混乱不堪了。人们对社会历史从未有过这样多的疑问。

历史上有许多杰出人物，他们能够在自然科学、文学艺术、治国安邦方面大放异彩，在社会历史观领域却陷入泥淖之中。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但却不能正确解释人性。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天生的，人性的内容包括仁、礼、信、义、智五种道德因素，以“仁”为主。不同的人由于生来的道德因素在比例上有所不同，或有或无，或多或少，人的本性因此也就显现出差异，出现了性善者、性恶者、又善又恶者。由于这种差异的存在，他把人性分为三个品第：上品人性善，下品人性恶，中品人性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就看如何引导。只有圣人才具有上品人性，百姓天生是中品的或下品的人。韩愈的错误有二：第一，把人性等同于道德，这是不对的；第二，把道德因素看作天生的，并由此将人分为上中下三等，也是不对的。北宋著名丞相、有“矫世变俗之志”，被列宁称赞为中国 11 世纪改革家的王安石，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和禽兽区别开来，是由于圣人教会了人们用火、种田和狩猎，因此，人类历史不过是圣人的“制作”史；至于人民群众，越无知越好，德政就是使人民无知。

历史上也有许多思想家、哲学家，站在自己所处时代的高度，试图用物质的原因来说明社会历史现象，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论点和推测。例如，孔子主张，先使民“富之”，然后“教之”。孟子把发展生产作为“德治”的基础。汉代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在探讨社会治乱的原因时说：“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论衡·治期篇》）这种看法不用上帝鬼神的直接作用来解释历史进程，而主张去寻求历史事件的具体原因，并力图说明英雄人物的行为要受到某种必然性的制约，有部分的真理性。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作为反封建、反宗教的资产阶级民主战士，曾提出“人是环境的产物”的著名原理。19 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满足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理论，力图有新的发现，他们初步认识到，所有制对社会制度有决定作用。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第一次正确地把人类的历史描绘为一个过程，并试图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他认为，环境不是最后的原因，在它背后还有更深刻的根据；人的意见也不是绝对自由的，而是受一种“更高级的因素”发展的必然性所制约，只有认识了这种必然性，才能有真正的自由。因此他主张，不能仅仅停

留在意见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上,而应该超越这种相互作用,发现某种新的“更高级的因素”。但黑格尔把这种“更高级的因素”归之于神秘的“绝对精神”,从而最终作出唯心主义的解释。

以上这些观点说法各异,互有得失,但总起来看,它们都没有摆脱马克思主义以前历史理论所具有的共同缺陷,那就是,归根结底它们都没有正确解决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把社会意识当作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把社会存在看成社会意识的派生物。这样,旧的历史理论就不可能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或者干脆否定社会生活的规律性;就必然要或者抹煞阶级对立的事实,或者用人的心性、政治等非经济的因素来解释阶级的划分和阶级斗争现象;就必然要否定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对于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列宁深刻地指出,一切旧的历史理论有两个最主要的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86页)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个人生活和社会里,如同沧海一粟,被种种复杂事物和关系包围着。他要认识这些事物,理清它们间的关系,不仅受到自己那个时代客观条件的制约,而且受到自己主观条件的制约。这一方面决定了他不能不犯错误,另一方面决定了以后的人们不能不用较长的时间才能认识和纠正错误。

社会历史,千古之谜。

直到19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社会关系急剧变化,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才诞生了科学的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一生所作出的两个重大发现中的第一个,是马克思认真汲取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成果,对它们加以分析批判,吸收改造后所取得的一项伟大认识成果。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停留在人们的思想动机面前,而是进一步探寻动机的根据,找出人们思想动机背后的客观的物质动因。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寻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5页)这样,历史理论第一次被置于唯物主义基础之上。曾经长期困扰人们的社会起源之谜、社会结构之谜、社会发展之谜、社会意识之谜、社会主体(人)之谜被一一解开,人类第一次有了正确评价社会历史的伟大的认识工具。

一、社会起源之谜

解开社会之谜，不能不首先说明社会的起源。人类社会是怎样诞生的？这个问题曾是人们任意遐想并引出许多美妙神话的问题，也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最混乱的问题。

1. 由猿到人

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对南美洲等地的地质情况和动植物区系进行考察获得大量科学资料的基础上，总结前人的进化思想和人工育种的实践经验，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创立了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生物进化论。达尔文证明，现存多种多样的生物是由原始的共同祖先逐渐演化而来的，低级生物进化为高级生物，人和动物有亲缘关系，是从猿进化来的。

四年后，另一位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主义的捍卫者和宣传者赫胥黎发表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一书，提出了“人猿共祖”的人类起源学说，并充分利用解剖学和胚胎学的最新成就，通俗易懂地阐述了人类和猿类的亲缘关系。

达尔文和赫胥黎的进化论思想，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因为，在此之前，人们一直认为《圣经》中关于人类社会起源的解说是唯一正确的，神学的观点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

《圣经》说，世界上存在的一切，都是上帝耶和华创造的。上帝在过了亿万年自由自在的生活以后，突然感到孤独寂寞，于是心血来潮，开始创造世界。第一天创造了光，称光明为昼，称黑暗为夜；第二天创造出了天堂；第三天创造出了植物；第四天创造了太阳、月亮和星星；第五天创造了飞禽走兽和鱼类动物；第六天创造出了人；第七天休息。所以，后来人们以每七天为一周。

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上帝用泥土造了个男人起名亚当，放在伊甸园里看守园子。一天，上帝又来到伊甸园，亚当向上帝诉说了自己的寂寞，于是上帝从亚当身上抽出一根肋骨，造了个女人夏娃，让他们结为夫妻，相伴度日。亚当和夏娃本无智慧，他们赤身裸体厮守在一起，为上帝照看伊甸园。园中长满了智慧树，树上结满了智慧果。一条蛇对他俩讲：“你们真傻，树上的果子是好吃的。”于是亚当和夏娃摘吃了果子，有了智慧，他们发现自己赤身裸体，十分羞愧，便躲藏起来。上帝来到园中，察觉他们偷吃了智慧果，犯了“原罪”，大为震怒。于是，上帝把亚当和夏娃逐出伊甸园，贬到地下，让他俩男耕女织，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成了人类的祖先。

中国古代也有“盘古开天”和“女娲造人”的神话。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宇宙混沌一团，像个鸡蛋，老祖盘古就孕育其中。过了一万八千年，盘古越长越大，一伸腿就碰到蛋壳而生痛，于是就用大斧把它劈了开来，轻的上升变为天，重的下沉变为地。盘古脚踩大地，手举蓝天。又过了一万八千年，天和地凝固了，盘古也累倒了。临死时，他呼出的气变成了风云，他的声音变成雷霆，左眼变成太阳，右眼变成月亮，躯体变成五岳名山，须发变成群星，血液变成江河，皮肤、汗毛变成花草树木，牙齿、骨头变成金属玉石，汗水变成雨露甘霖。

盘古开天后，女娲用黄土捏成泥人，吹一口仙气，泥人变成了活人。用

手捏出来的人，比较精细，是富贵的人；用粗绳醮出来的人，比较粗糙，是贫贱的人。女娲造人，有男也有女，他们婚配繁衍，形成后来的人类。

这些神话传说，是生产力极不发达、科学尚未诞生时期的产物。它虽然反映了人们极力想搞清楚自己诞生和社会起源的奥秘的迫切愿望，本身却是错误的，甚至是荒唐的。进化论思想的出现，宣告了神创论的破产，第一次把生物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是对神学观念体系致命的打击。正因为如此，它关于人类起源的思想不能不受到来自教会方面的人最为激烈的攻击。

1860年6月31日，牛津大学大厅内挤满了人，一场论战正在激烈进行。威尔伯福斯大主教声色俱厉地指责达尔文的进化论：“谁看见过而且正确地证明过一些物种转化为另一些物种呢？难道可以相信菜园里一切比较有益的芜菁变种都能变成人吗？”然后，他转向赫胥黎：“我想问一问坐在我对面的、准备把我撕碎的赫胥黎教授，当我结束我的演讲的时候，他是否还认为人类起源于猴子呢？他是否还认为他自己由祖父是猴子还是祖母是猴子发生的呢？”面对这极端无知而又气势汹汹的野蛮挑衅，赫胥黎以大无畏的气概给予反驳，郑重宣告：“我曾说过，现在我再重复一遍，一个人没有任何理由为他的祖先是一个无尾猿而感到羞愧。”他又说，“只有不学无术、固执己见，用废话和宗教偏见扰乱视听的人，才是真正可耻。”

真理终将取得胜利。在这场著名的“牛津大论战”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科学一次次地证明，进化论是正确的。生命是以蛋白质和核酸的方式存在，是自然界的物质长期演化的结果。地球上的生命，从最原始的无细胞结构生物进化为有细胞结构的原核生物，从原核生物进化为真核单细胞生物，然后按照不同方向发展，出现了真菌界、植物界和动物界。植物界从藻类到裸蕨植物再到蕨类植物、裸子植物，最后出现了被子植物。动物界从原始鞭毛虫到多细胞动物，从原始多细胞动物到出现脊索动物，进而演化出高等脊索动物——脊椎动物。脊椎动物中的鱼类又演化到两栖类再到爬行类，从中分化出哺乳类和鸟类，哺乳类中的一支进一步发展为高等智慧生物——人。在生物进化过程中，自然界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能够适应变化的物种今天存在下来了，不能适应变化的物种则被无情地淘汰。在这个意义上，人类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总之，人是经过千万代转化后，从动物界脱胎出来的；社会是经过长期演变后，从自然界分离出来的。

恩格斯对达尔文的进化论给予高度评价，把它和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定律并称为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发现。他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兴奋地说：达尔文的著作写得简直好极了，目的论过去有一个方面还未被驳倒，而现在被驳倒了。恩格斯所以赞扬达尔文，就是因为他驳倒了上帝造人的神学谬论，从生物学的角度正确说明了社会的起源。

2. 劳动的决定作用

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有局限。它仅仅从生物进化的角度出发，把人看成自然的人，生物的人，把人的本质看成是动物的自然属性或物种的特性，虽然有其合理性，对于完全说明人类社会的起源，还是不够的。因为，当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以后，就与动物有了本质的区别。人所组成的社会，是物质运动的最高形式，是人们在物质生产基础上，在相互交往、共同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有机体，与自然之间不容混淆的界限。而仅从生物进化

的角度，不足以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不足以把社会和自然区别开来。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看，人和动物都是地球上的生物群体，除了量的差别，没有质的不同。

弥补达尔文的不足，从而真正解开了人类社会起源之谜的是恩格斯。他针对达尔文学派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劳动创造人”的著名论断。这个理论既充分肯定人是由猿进化来的，生物意义的发展是人类诞生的自然前提；又突出强调了劳动这一使人和动物相区别的因素在社会起源中的作用。这样，恩格斯克服了达尔文学派把人类起源和发展简单地归结为动物的起源和进化，把人类起源和发展的规律简单地归结为生物发展规律的缺点和局限，准确而又全面地说明了人类社会的起源。

大约在三千万年以前，地球上生活着一种高度发展的古猿。它们形体较小，头脑较大，满身是毛，有须，耳朵尖耸，以果实树叶等为主要食物，成群地生活在树上。

大约几百万年以前，地球上出现了造山运动，引起气候的变化，大片树木死亡，森林枯谢，一望无际的森林区变得稀稀疏疏，树间空隙随之增多和扩大。森林减少，食物短缺，古猿在死亡的威胁下开始分化，一部分被迫下树，营地生活。起初它们生活在林间草地上，借助于前肢的帮助开始半直立行走；以后它们学会直立行走，逐渐离开林间草地走向空旷的平原，迈上人的发展道路。恩格斯认为，学会直立行走，是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直立行走带来了一系列变化。首先，视野扩大了，肺和声带得到自由的发展。其次，后肢开始向脚的方向发展，成为专司行走的器官；前肢开始向手的方向发展，学会使用石器和木棍，专门从事其他活动。使用天然工具最初完全是偶然的，生活的需要使它变成经常的。于是，手变成了使用天然工具获取生活资料的器官。由于使用天然工具，手的肌肉、韧带、骨骼发生了变化，大拇指变得长而有力，灵活的与四指相对活动。手变得自由了，能够不断地获得新的技巧，而这样获得的较大的灵活性遗传了下来，并一代一代地增加着，经过长时间的积淀，量变引起质变，猿手变成人手。如果说脚的直立是为了便于猎取食物，是劳动的产物，手作为使用工具的器官，同样是劳动的产物。

劳动还使语言得以产生。人类的祖先是合群的动物，它们结成群体，共同生活，共同追捕或防御野兽，共同分享劳动果实。共同劳动和集体生活需要协调配合，交流思想，表达情感，这一切使正在形成的人彼此间到了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最初发出一些没有节奏的音调，以后音调的抑扬顿挫不断增多，慢慢地学会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最后语言随之产生。恩格斯说：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是唯一正确的解释。

劳动和语言一起把猿脑变成人脑。工具的使用，使手接触到越来越多的物体，手上的神经要把外部的刺激传给大脑，促进了大脑的发育；语言的产生，使大脑可以利用它来进行思考并通过它来交流思想感情。不断地交流，不断地思考，使大脑越来越发达，思维能力越来越高。与此同时，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完善起来。大脑、感觉器官、日益清晰的意识以及抽象思维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初步形成，使人对周围的环境和事物有了粗浅的认识，萌发出人类特有的自觉能动性，反过来又推动了劳动的进一步发展。

劳动，尤其是与凶猛野兽的搏斗，需要锋利的石片，带棱角的棍棒。人

类祖先先是用天然石片、树枝充当工具；继而靠打碎石头削剪树叶获得工具，这便是制造工具的开始；在经过一段漫长的实践后，他们终于学会自觉地使用工具来制造工具。工具的制造，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把人的活动和动物的活动区别开，是人猿相揖别的标志。从此以后，人类开始了自己的生活。

动物仅仅适应自然界，由自然选择决定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人不仅适应自然界，而且利用自然界，改造自然界，使之为自己的生存发展服务。从直立行走制造工具，人类诞生过程中每一步的完成，既不是上帝的恩赐，也不是自然的给予，是人类祖先从事劳动的结果。从猿转变到人的历史证明，劳动是将人从动物界提升出来并成为人的其他活动的物质基础的历史活动。

劳动创造了人，也创造了社会。

劳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是社会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没有人，就无所谓社会，也无所谓历史。人要生存，必须吃、穿、住。满足人们吃、穿、住需要的物品称作生活资料。生活资料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不会自动送到人的身边，全靠人自己通过劳动获得。劳动需要工具，需要材料，需要能源等等，劳动生产中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称作生产资料。生产资料靠生产才能制造出来。历史的第一个活动就是满足生活需要的生产劳动。整个社会的存在发展建立在生产劳动创造的财富的基础上。没有无数代人艰辛的劳动，就没有我们今天。所以马克思说：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社会的非常深刻的基础，一旦它停止，哪怕只停止一年，人们就会看到，不仅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人本身的存在也将没有了。

劳动中形成了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社会关系的存在。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没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人们彼此孤立，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社会就失去了维系自身的纽带。社会关系，按马克思的意思，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社会关系是为了劳动和适应劳动而产生的。人满足吃、穿、住的需要，获得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在本来的意义上，只要同自然界打交道，向自然界索取即可，也就是说，只要从事物质生产即可。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单个的人在自然面前无能为力，在进化过程中，他已失了动物所具有的特殊生存能力，跑得不快，跳得不高，视力不佳，嗅觉不灵。但另一方面，人类在发展中又形成了一些新的更强的生存能力：发达的大脑，灵巧的双手，彼此合作所产生的巨大整体力量等等。只是这些新的更强的生存能力的存在，需要满足一个前提条件：一定要有社会关系存在。就是说，只有在社会关系中，人类才能形成新的更强的生存能力。实际的情况是，人为了获得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以一定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先是简单的生产关系，如简单协作、分工；后是复杂的生产关系，如不同生产部门中工人、农民、商人、知识分子的关系，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剥削和被剥削关系；进而派生出人和人的其他社会关系，如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等。今天，生产力的发展已使社会关系紧密到这样一种程度，一个国家要想把经济搞上去，使自己强大，必须对外开放，而不能闭关锁国。

常听人说，某些科学家、艺术家的活动是个体活动，与社会和他人没有关系。这是不对的。一个人，无论他是工人、农民，还是科学家、艺术家，无论他的活动看起来多么孤独，多么与他人没有往来，实际上都处在社会关系之中。他的吃穿住，他使用的劳动工具和思想资料，都凝结着别人的劳动，因而总有千条丝万缕线把他和他人、社会联系在一起。要是真像某些人说的与社会、他人没有关系，他既不会成为科学家、艺术家，也不会成为工人、

农民。

劳动过程是客观的物质运动过程，蕴含着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从事劳动的人，劳动所需的资料，劳动的对象是客观的物质的，劳动过程也是客观的物质的。这一过程和自然过程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在社会关系体系中由人自觉创造推进的过程，是社会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和自然过程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作为客观的物质运动过程，都有规律可循。

规律是事物本身发展中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社会规律就是人的实践活动本身发展中所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人的实践活动首先是物质生产，它的规律制约支配着整个社会的发展。物质生产规律蕴藏在劳动过程中各种因素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相互作用的关系中。没有劳动，就没有劳动过程中各种因素间的关系；没有劳动过程中各种因素间的关系，就没有相互作用；没有相互作用，就没有物质生产规律；没有物质生产的规律，也就没有在它的基础上派生演变出来的其他社会规律。

今天的社会是高度发达的社会，已经复杂到令人眼花缭乱的程度。生产劳动只是人们所看到的众多活动中的一种，在许多人眼中甚至不是最值得关注的一种。然而，今天的社会是以往生产劳动创造的结果，生产劳动在任何时候都是社会赖以存在的最深刻的基础。人类社会存在一天，生产劳动就要进行一天。完全有理由说，打开了劳动这个“黑匣子”，就找到了社会起源的秘密。

3. 观察的出发点

劳动创造了人的观点，不仅揭示了社会的起源，而且为解开社会其他之谜奠定了科学方法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研究社会时，有一个基本方法，叫做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里的“逻辑”是指反映社会历史进程的理论，“历史”是指客观现实的社会历史进程本身。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就是反映社会历史进程的理论要与客观现实的社会历史进程本身根本相一致。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要求人们在研究社会历史时，在揭示被考察对象发展的规律时，在安排理论体系各个概念、范畴的逻辑顺序时，必须符合被考察对象本身的状况。

按照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研究考察社会，只强调逻辑，不顾历史状况本身，是不行的。首先，离开历史，不可能得出“逻辑”。我国宋朝时期主观唯心主义集大成者王阳明，称自己的哲学为“心学”。认为“心”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善”。“心”决定并产生一切。一天，王阳明在家里和一个朋友热烈讨论如何悟彻天下万物的道理，变成圣贤。王阳明指着屋前亭子旁边的竹子，叫他的朋友面对竹子修心思寂。他的朋友就从早到晚坐在竹子前面，想悟彻其中的道理，由于竭其心思，精力尽耗，到了第三天，就病倒了。王阳明还不死心，自己也发疯般地静坐在竹子前，苦思冥想，但始终悟不出什么道理来，到了第七天，他也劳思成疾，病倒了。于是，他们相对感叹：“圣贤是难以做到的，人们也

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悟彻天下万物的道理。”且不管这话他们说对不对，有一点可以肯定，仅凭“心”想，再有能耐的人也悟不出道理；不仅悟不出天下万物的道理，而且也悟不出竹子这一简单事物的道理。其次，离开历史，即使得出逻辑，也不可能是正确的。魏晋南北朝，社会长期处在无休止的战祸、饥荒、疾疫、动乱之中。“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路道断绝，千里无烟”；“饿死衢路，无人收识”。连皇室贵族都经常是刹那间灰飞烟灭，变成死尸或沦为奴隶，下层百姓的无穷苦难更不待言。于是社会上香火日盛，佛风渐行，人们以今生的绝望，寄托来世的天堂，宿命论思想一时竟成为时尚。《列子·力命》借一则寓言故事说：同样的行为，其结果为什么不一样，有人幸有人不幸？从才能和道德上找原因是错误的，这些都是命中注定，非人力能及的。只要安于命，一件破短袄，穿起来会感到有狐貉之温；一碗粗米饭，吃起来会有细米的味道。这种宿命论的解释，讲的头头是道，编排精细，仅从逻辑角度看，能说它错误吗？但从历史的真实状况看，又有谁说它是正确的呢！

按照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研究考察社会，只目睹历史事实，不注重逻辑，不注重历史事实间必然性、规律性的联系，也不行。公元前44年3月15日，凯撒大帝被杀害于罗马元老院。凯撒死后，安东尼和屋大维为争夺继承权兵戎相见，以安东尼兵败自杀告终。一位名叫巴斯噶的外国学者对此发表看法：“假如克里奥佩特拉的鼻子生得短了一点，世界的整个局面将随之而完全不同。”克里奥佩特拉，埃及女皇，不仅精明，而且长得十分漂亮。凯撒、安东尼、屋大维都为她的美色倾倒，引出了一些事情。巴斯噶的意思是，克里奥佩特拉的鼻子若短一点，就不那么漂亮，就不那么吸引人了，凯撒和安东尼也就不会死了，整个历史自然就不一样了。在这里，凯撒被刺杀，安东尼和屋大维兵戎相见，安东尼兵败自杀及克里奥佩特拉的漂亮，都是历史现象。巴斯噶看到这些现象，把它们罗列在一起，但不知道这些现象之间有何联系，不知道它们彼此间的内在逻辑，简单地把事件归结为偶然的、无规律的东西，从而把历史看作偶然事件的堆积。持这种观点的不仅巴斯噶一人，鸿门宴上项羽不杀刘邦；1933年美国总统一罗斯福被刺未中；1923年慕尼黑兵变中希特勒遭德国国防军士兵的连珠射击竟而逃脱……在对这些事件的评价中，均有一些人像巴斯噶一样主张，如果项羽杀了刘邦，如果罗斯福被刺身亡，如果希特勒被国防军士兵的连珠射击击中，整个历史将全部改观。这些把社会历史看作偶然事件的堆积和由偶然事件所决定的人，不能说没看到历史，但历史对他们如同古籍对文盲，是无意义的。他们没有“逻辑”，不明白或看不懂眼前出现的一切，得出的结论自然不能令人信服，很容易被严肃的学者或历史事实本身推翻。

既然人类社会起源于劳动，劳动创造了人，产生了社会关系，形成了社会规律和社会存在的最深刻的基础，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的活动史，就是人怎样利用自然的、社会的、物质的、精神的手段和条件自我发展、自我创造、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历史，按照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就应该以劳动实践作为我们观察社会历史的出发点。

劳动实践是人同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过程。从劳动实践出发，就是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它可以使我们避免只强调逻辑，不顾历史的唯心主义错误。

劳动实践是人在思想、观念、意识支配下对客观对象发出的主动行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自觉的意图，都有预期的目的，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

结果，在劳动过程开始时，已经存在于劳动者的观念中，是劳动者预期的目的或观念的实现。因此，劳动实践过程又是有目的的、能动的过程。从劳动实践出发，就是要充分认识和把握主体能动性，它可以使我们避免只从客体的或直观的角度看问题，而忽视“逻辑”的旧唯物主义错误。

马克思说：“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这段话可以这样理解：当我们陷入困惑的时候，当我们面对一个个谜团不知所措的时候，就深入到生活中去，深入到实践中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任何社会之谜都可以通过对实践的分析或对实践本身的理解得以解开。

马克思当初就是这样做的，结果创立了历史唯物论、剩余价值论和其他革命理论。

我们今天也应这样做。

二、社会结构之谜

中国古代有许多富有哲理的寓言，《列子·说符》中记载了一则关于战国初期魏国哲学家杨朱的故事：杨朱家的邻居走失了一只山羊，连忙召集全家老小去追寻，又请求杨朱派他的家僮门人去帮忙。杨朱怪而问道：“咦，只走失了一只山羊，何须这样多的人去追？”邻居回答说：“岔路太多了。”过了半天，去追羊的人垂头丧气地回来了。杨朱问：“羊找到了吗？”邻居告诉：“没找到。”杨朱又问：“去这么多人，怎么还会找不到？”邻居答道：“这条大路有岔路，岔路上又有岔路，我们不知道羊跑上了哪条岔路，人再多也无济于事。”杨朱听完这番话，顿时戚然变容，半晌没言语，整日不见笑容。

这个故事叫做“歧路亡羊”。歧路，就是岔路，亡，就是丢失。人们用它比喻有的人在学习、工作或生活中迷失了正确的方向。杨朱所以整日不乐，忧心忡忡，大概就是因为他担心人们这样懵懵懂懂，迷失方向，将来可能要吃更大的亏！

杨朱的担心很有道理，人们在观察社会历史时，常犯追羊人的错误。

4. “弥诺斯迷宫”

弥诺斯是希腊神话传说中克瑞特国国王。他让建筑家、雕刻家、最伟大的艺术家代达罗斯为牛首人身的恶怪弥诺陶洛斯建造了一所住宅。这费尽心思建造的迷宫迂回曲折，无数的柱子盘绕在一起，如同佛律癸亚的迈德洛斯河九曲十八弯的河水一样，像是在倒流。弥诺斯借口自己的儿子在阿提刻被人杀害，而向这个国家的人民复仇，要求他们九年一次送七个童男七个童女到克瑞特作为贡品。这些童男童女到达克瑞特之后，弥诺斯就将他们拘禁在他那有名的迷宫里，让他们或者因迷路饥饿而死亡，或者被可怕的怪物弥诺陶洛斯所杀害。

社会具有复杂的组织结构，是一座更为令人困惑的迷宫。

人们生活在社会里，看到的是光怪陆离、无奇不有的大千世界，迎来的是扑朔迷离、接踵而至的团团迷雾。既有大国攻小国，大家乱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也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杀富济贫，相互帮助，刚正仁义。一会儿海湾战争，狂轰滥炸；一会儿柬埔寨和平，万众欢腾。今天报纸电台盛赞某歌星舞台风采，明天杂志电视披露他（她）偷税漏税。上学的当了穷教授，落榜的成了阔老板。张家长，李家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面对这万花洞般的现象，如何解释，如何选择，如何行动，如何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达到自己的目的？以此，人们常常迷失，常常无所适从，于是有了各种各样的错误观点。

第一种错误观点，把道德看作“迷宫”的支柱，社会的根本。

汉武帝初立，欲成就一番帝王大业，降旨各地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亲自策问古今治国之道。汉代名儒董仲舒对汉武帝说：“道”是治国之路。所谓“道”，就是仁、义、礼、乐，亦即德行。以往的圣贤之王去世后，他们的子孙所以能长期执政并使国家社稷几百年平安无事，皆是礼乐教化的功劳。反之，周朝所以在周厉王和周幽王期间衰败，不是“道”本身不行了，而是厉王和幽王不遵从它。作为一个国君，心正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百官正，

百官正则万民正，万民正则四方正，四方正则远近各国不敢不归于正，从而邪气奸恶不能存在。这样一来，就会风调雨顺，阴阳和合，国家富足，百姓安居乐业，能够带来吉祥幸福的东西莫不恭敬齐聚圣上身边，帝王的大业也就建成了。董仲舒接着说：今天，圣上虽已有行道的能力和条件，且行为高尚，恩泽深厚，通晓事理，意愿美好，爱护民众，亲近贤良，可称得上圣贤之主了，可为什么天地尚无反应，美祥皆至的盛世情景也未出现呢？因为圣上没有推行道德教化。教化不立，万民不正，一般百姓趋于获得物质利益，犹如水往低处流，不以教化筑起大堤防备，是不能阻止的。古代圣王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在治理国家社稷时，都以教化为首要任务，圣上也应该如此才是。在这里，董仲舒把道德视作现象的本质，“迷宫”的支柱，社会的根本，它不仅决定社会的乱与治、衰与兴、胜与败，而且能够感应天地，引来风雨阴阳的调合顺畅，吉祥之物的趋之若鹜，其作用可谓巨大无比。其地位可称至高无上，在我国历史上，持董仲舒这种观点的人很多，两汉以来，直到清朝末年，众多帝王将相、大儒名士莫不如此。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汉武帝，说他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对内侈宫室，对外四处征战，信惑鬼神，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惫，起为贼盗，与秦始皇差不了多少，然而为什么秦朝灭亡汉朝得免呢？主要因为汉武帝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治史者从历史经验中概括出这样的结论，可见德为根本的观点影响之深远。

道德是一定社会调整人们之间、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以善和恶，正义和非正义、公正和偏私、诚实和虚伪等概念来评价人们的行为，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和社会舆论的力量，使人们逐渐形成一定的信念、习惯、传统而发生作用。道德的这种作用是巨大的，是社会不可缺少的。但道德属精神范畴，是社会意识的一个部分，是第二性的，派生的。人们随时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被董仲舒等人视为“迷宫”支柱，社会根本的道德是怎样产生的？上天赐予的还是人们规定的？人们根据什么作出规定？为什么这样规定而不是那样规定？为什么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人们的道德观念那么不同，发生那么大的冲突，出现那么大的变化？思考这些问题不难发现，还有某种比道德更深刻的东西在起作用，道德不是最根本的。

第二种错误观点，把法律看作“迷宫”的支柱，社会的根本。

西方有一种“社会契约说”，认为随着社会生产技术的发展出现了私有制和不平等，人类摆脱了自然状态展开了竞争与倾轧，人们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就缔结契约，把自己的一切交给集体，以此换取对个人权利的保障。这样就产生了国家，出现了集中掌握权力的君主和平等享有权益的臣民。“社会契约说”和“君权神授”论相对立，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但在理论上仍然是错误的。被压迫人民决不会自愿订立一个“契约”，让别人压迫自己。

按照“社会契约说”，法律的作用至高无上。契约本身即带有法律性质，履行契约，保障缔约者的权益也要靠法律。法律好，社会稳定繁荣，法律完善，人民安居乐业。因此，有人提出“法律决定一切”，把法律看作社会根本。

法是国家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用强制力量保证其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原始社会没有法，人们之间的关系靠习惯来调整和维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出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不同的阶级，才需要以新的社会规范——法来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应当由它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加以说明。所以，法律和道德一样，是第二性的，派生的，我们对道德提出的问题，对法律同样适用。法律不是“迷宫”的支柱，社会的根本。

第三种错误观点，把教育看作“迷宫”的支柱，社会的根本。

法律是人制定的，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认为，人本身怎样，直接关系到法律的好坏，制定好的法律，依赖天才的立法者。而人本身、天才的立法者，是教育的产物。刚出生的人在获得感觉以前，心灵是块“白板”，大家都一无所知，在智力上天然平等，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后来所以有天才，有笨蛋，有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由教育造成的，教育万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成为天才的人物，就能制定出完善的法律，革除社会弊端，促进人类进步。因此，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中，不乏把教育当作治国救民之根本者。

马克思说得好，教育者一定要先受教育。马克思的意思是说，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把教育当做“迷宫”的支柱、社会的根本，是错误的。因为，教育别人的人一定要先受教育，把先受教育的人所从事的活动——教育当做根本，在理论上是形式逻辑中的同一反复，就像说红的就是红的，人的根本就是人的根本一样，没有增添任何新的内容，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因此，尽管教育在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却不能把它当作社会的根本。

道德不是社会的根本，法律不是社会的根本，教育也不是社会的根本。“弥诺斯迷宫”中有许多岔路，凡选择道德、法律、教育的，都失去了正确方向，都会永远困在“弥诺斯宫”中。

怎样才能走出“迷宫”呢？怎样才能找到社会的根本呢？

5. “阿莉阿德尼线”

当弥诺斯第三次向阿提刻人索取童男童女做贡品时，阿提刻的王子和王位继承人提修斯在人民中站出来，宣布他自己愿和其他13个童男女一起去。人们赞美提修斯的崇高无私，怀着悲痛的心情送他们登上前往克瑞特的船上。在弥诺斯那里，提修斯的勇敢英俊引起美丽的阿莉阿德尼公主的注意。她偷偷地去见他，向他表白自己的爱，并给他一个线球，教他将线球的一端紧拴在迷宫的入门处，然后放着线通过多歧而混乱的路到弥诺陶洛斯那儿去。她还给他一柄魔剑，用来斩杀这个怪物。弥诺斯将所有的童男女带进迷宫里。但提修斯领导着他们找到了弥诺陶洛斯，并以阿莉阿德尼给予他的魔剑将它杀死，然后顺着线走出迷宫，逃出了克瑞特王国。

认识社会结构，走出历史迷宫，也有一条阿莉阿德尼线。这条线的要旨是：（1）不能不分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2）不能停留在表面层次，津津乐道于事物的现象；（3）更不能盲目的随心所欲的把社会生活一个并非主要的方面，像董仲舒等人那样，看作社会的根本。反过来看，透过现象，分清主次，层层分析，抓住本质是走出迷宫的办法。

几年前，河南某地破获了一起盗窃走私文物案，A和犯罪集团的其他成员被捕入狱，受到法律应有的惩处。消息传来，A的亲朋好友和中学的老师同学无不感到震惊，由此引出下面一段谈话。

老师：“A在学校一直表现很好，老实忠厚，关心爱护同学，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真让人不能相信！”

亲戚：“都是 B 挑动的。A 原来不想干，B 整天缠着他，说那些东西埋在坟墓里也没用，挖出来卖了，还能弄个钱花花，这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古墓吃古墓，不吃白不吃。×××干成了一次就发了，你家里穷得那个样，干嘛不干一次？A 动心了，结果进了监狱。”

同学：“主要还是 A 自己不好，B 说得那些话，不听不就没事了。”

朋友：“我看啊，要是没有对外开放，没有老外高价买这些东西，也就没事了。”

同学：“这话不对，没有对外开放，还像以前那样，你家里能有电视机、收录机吗？能过上今天这样的日子吗？”

老师：“唉，还是为了钱啊。”

亲戚：“钱这东西确实不是个好东西，好端端的孩子，为了钱，进了监狱。不过话又说回来了，A 家在农村，父母有病，弟妹上学，穷得丁当响，要是稍微富裕些，也许他就不会干这种事了。”

说到最后，大家各持己见，不了了之。

A 盗窃走私文物是件小事。我们借用这件小事是想说明：世上的事情，无论大事还是小事，都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如果不加分别，就会感到每种因素都起作用，每种说法都有道理，从而花了眼睛，乱了思绪，发现不了事件产生的主要原因，自然也谈不上对事件的正确认识和正确说明；决定事件的因素无论多么复杂，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物质因素，一类是精神因素，观察社会历史，第一步就是要区分这两类因素，确立物质因素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精神因素是次要的，起非决定作用。

物质因素或物质现象很多，地理环境就是一种物质因素或现象。地理环境是指与人类社会所处的位置相联系的各种自然条件的总和。如气候、土壤、山林、水系、陆地和水中的矿藏、动植物的分布等等。地理环境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条件，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永恒的、必要的物质前提。

物质现象相对精神现象来说，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方面，相对社会存在这一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来说，不是所有物质现象都起决定作用。地理环境在社会存在和发展中就属于这一类不起决定作用的物质现象。

1988 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海南建省，在辽阔的中华大地掀起一股强劲的海南潮。一夜之间，五指山下贫穷的土地变成发财致富的聚宝盆，万泉河边无人回眸的丑小鸭变成众人齐颂的白天鹅。昔日封建皇帝流放犯人的地方，今天强烈地吸引着众多有胆识、有才干、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人。许多分配到了工作的大学毕业生、许多坐惯办公室的机关干部、许多已经发财和没有发财的个体经营者，放弃了自己到手的舒舒服服安安稳稳的工作和生活，乘坐火车、轮船、飞机一齐来到海南，一时间，竟使这个祖国第二大岛人满为患。

何以至此？

有人说，海南的自然条件太好了，还有比得上海南的吗？大自然的造化。

海南行政负责人却不以为然。他反问道：难道上帝不是存在很久了吗？大自然的造化是不是也很久了？历史上的海南不就是这个样子吗？为什么以前人们不来？因为海南太穷，空有蔚蓝色的海水却独守闭塞，空有丰富的热带资源却不能化为财富。截至 1986 年，海南岛全部国民生产总值不及内地某些县多，仅二三十亿元，人均 447 元，排全国第 25 位。为什么现在人们蜂拥而至？不是什么自然条件太好，更不是什么上帝的造化，是因为中央给了海

南最优惠的特别政策，这些政策预示着海南未来的经济腾飞。。

海南变了，海南的地理环境没有变。海南所以变了，是因为海南的经济环境变了。这个事例告诉我们，观察社会历史，第二步是从物质现象中区分出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确认经济关系是众多物质关系中更为重要的关系。

工人、农民、商业工作者、科学技术人员等不同生产部门的成员之间的某些关系属于经济关系，商品的产供销关系、国民经济中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也属于经济关系。中央给予海南的“最优惠的特别政策”是关于这些方面的政策吗？不是。它涉及这些方面，主要不是这些方面，而是与生产关系相关的政策。例如，土地可以出租，职工可以高薪，企业可以采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管理的办法。生产关系是在生产中结成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它包含三个方面：（1）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即生产资料归谁所有；（2）产品的分配关系以及由它直接决定的消费关系；（3）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地位和相互交换活动的关系。无论海南还是中国，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生产关系方面的变革都将对社会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经济关系中的其他关系难以比拟的。观察社会历史，第三步是在经济关系中抓住生产关系。

一个社会的生产关系不是单一的，往往存在三种类型：代表过去社会的旧的生产关系的残余；代表现在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代表未来社会的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我们国家现在就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既有公有制的国营大中型企业、集体企业，也有私有制的个体企业、外资企业，还有中外合资企业。把它们混淆在一起，我们就无法区分一个社会不同于另一个社会的性质，就无法确立什么是原始社会，什么是奴隶社会，什么是封建社会，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所以，观察社会历史，第四步是对生产关系进一步分析，抓住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生产资料所有制、产品的分配和消费、人们的社会地位和交往关系）的总和，构成该社会的经济基础，并规定了该社会的性质。举例说，当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资本家所有制，人剥削人，不劳而获时，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当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全民所有制，没有剥削压迫，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时，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

以上四步经过的路线，就是我们的“阿莉阿德尼”线。沿着这条线，我们就能走出社会历史迷宫，就不会在岔路口上迷失，就不会落入“弥诺陶洛斯”之口。沿着这条线，我们就能透过万花洞般的表象，就能揭示社会结构的秘密，不会斩不断，也不会理还乱。

6. 结构揭秘

“结构”这一概念是指事物的基本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社会结构就是社会的基本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经济、政治、文化是一个社会基本的构成部分，它们在人类长期的实践中各自又形成了自己的结构，即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三者的有机结合构成社会的宏观结构，即通常所说的社会结构。

社会经济结构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为经济结构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不能任意产生，它要与自己时代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相适应。

生产力是人们解决社会同自然矛盾的实际能力，是人类征服和改造自然使其适应社会需要的客观物质力量。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一个农民一年辛勤劳作所收获的粮食的多少，即是他能力的展现，也是他所具有的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大小的标志。不同的时代生产力的水平不同，和李绅诗中所描述的唐代农民相比，今天的情况要好得多了。

拖拉机，
真气派。
千亩粮田，
眨眼之间翻起来。

拖拉机和锄头的差距，是两个时代、两种生产力水平的差距。人类在生存发展中，要求自然界提供更多的物质生活资料，而自然界不但不自动地把这些资料奉献在人类面前，还常常给人类出难题，一个要，一个不给，这就形成了社会和自然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靠人们的生产实践。生产力即是标志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这个矛盾，或在解决这个矛盾时具有多大能力的哲学范畴。

从前有户人家，父亲刚刚去世，只剩兄弟二人。有一天，老二对老大说：“哥呀，咱们分家吧。你身体壮，有力气，就到山上住吧，我身体总是不舒服，就住在家里。父亲留下的田归我，牛和马也归我，那把锄头归你，你看怎么样？”老大说：“好。”扛着锄头上山了。他早出晚归，开荒种地，勤劳无比，几年后，盖了新房，买了牛马，娶了媳妇。老二呢，好吃懒做，怕苦怕累，终日闲逛，几年后，牛杀了，马卖了，地也还债了，成了一个二流子。本来老二从事生产的条件比老大好得多，但最后的结果却大不一样。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生产力是在劳动中形成的。生产力由三个基本要素组成：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劳动者。劳动对象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对之进行加工，使之变成一个有用物品以满足人们需要的那一部分物质资料。如土地、田野、森林、江河湖海、制造家具的木材、制造机器的钢材、做衣服的布匹等等。劳动资料是在劳动过程中用以改变或影响劳动对象的物质资料，如牛、马、锄头、机床、发电机、计算机、汽车、飞机等等。劳动资料的构成复杂，涉及的范围广泛，它从不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总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变化。生产工具是劳动资料中最主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成员。劳动者是指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劳动技能和科学知识的人。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主要、最活跃的因素。没有人，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只是一堆“死物”，是可能的生产力而不是现实的生产力。只有当人这个积极主动的因素参与进去，开始生产劳动时，劳动对象、劳动资料才会由可能的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由不会产生他物的“死物”变为能够产生他物的“活物”。老二穷困潦倒，老大勤劳致富的奥秘就在这里。

在现代社会中，对生产力的发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科学技术。一系列新兴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等，都建立在新兴科学技术的基础上。科学技术不是生产力的独立组成要素，但它作为智能性因素，渗透在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中，使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发生重大变化，进而造成生产力的飞跃。完全有理由说，近代以来的每一经济时期，现实的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主要取决于

被生产所占有的科学技术力量。人们预测，由科学技术革命掀起的第三次浪潮，必将引起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管理方式、决策方式、家庭关系、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国家关系等各个方面深刻的变化。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已由无数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总和——社会的经济结构，也常被称作社会的经济基础。

社会的政治结构是指建立在经济结构之上的政治法律设施、政治法律制度及其相互关联的方式，包括政党、政权机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和关于政权的组织形式、立法、司法、宪法的规程等。

政治结构反映社会各阶级或不同集团、阶层的由经济地位决定的分配利益。不同阶级、阶层、集团的利益常常不一致，有时甚至彼此对立、冲突，这就需要有了一定的社会组织加以控制，从中调解各方面的利益和冲突。例如，一个人的名誉受到另一个人的侵犯，可以在法庭上解决；一个地方发生暴力冲突事件，可以靠警察、军队平息。政治结构是整个社会中起控制作用的部分，国家机关作为政治体系运行的基本设置，又是政治结构的核心，因而国家机关是整个控制系统的核心。

政治结构的基本功能是组织和保护社会经济生活。为此，它首先要适应经济结构，追踪经济结构，围绕着经济发展的中轴线而演变。经济需要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它就制定相应的法规，保障外国人的合法权益；经济需要开展竞争，它就颁布《商标法》、《专利法》，保障竞争在公平的范围内进行。然后，它依据政治制度和法律规范的条文，借助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国家机关等机构和设施，以强制的方式发挥自己的作用，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

政治结构除了集中地反映一定的经济结构，服务于、反作用于经济结构，还广泛地影响和制约着社会的文化结构。

哲学谈论的“文化”，有广义、狭义两种含义。广义的文化概念是指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结果，即人们在其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中创造的一切，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以及社会的风土人情、习俗、风尚等等。通常所说的“酒文化”、“食文化”、“服饰文化”，通常所见的骑马坐轿、披麻戴孝，都属于这一类。社会文化结构中的“文化”，是狭义的文化，仅指由一切观念形态组成的有机系统，包括哲学、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观念、宗教、艺术等有确定规范的系统化的社会意识及其联结方式。这些观念形态通常又被称作意识形态。《红楼梦》研究、人生观大讨论、学习雷锋好榜样、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等，都是狭义文化范围内的事情。

社会文化结构建立在经济结构之上，各种观念形态从不同的侧面以不同的方式反映社会生活。由于它们的基础都是社会的经济结构，使得它们在内容上必然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形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社会。其中，政治思想作为一定社会经济结构最直接、最集中的思想表现，往往处于核心地位，起着主导作用。一种观念或数种观念同政治思想发生冲突而最后不得不服从政治思想的事，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极为普遍。

现实的文化结构中，多种性质的文化同时并存，其中一种占主导地位。文化结构的本质特征，即由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决定。而在经济结构中占统治

地位的阶级，一般说来，其思想也在文化结构中占主导地位。

社会文化结构具有独特功能。和政治结构的强制性方式不同，它以说服的方式劝导不同的集团和阶级，把统治阶级的意志要求内化为人们的思想、情感和心理，以此达到全体社会成员对统治阶级利益的认同，自觉自愿地按照统治阶级的要求去做，从而支配人们的行动，最终服务于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

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都建立在经济结构之上，因此都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政治结构称作政治上层建筑，文化结构称作思想上层建筑或观念上层建筑。

经济结构是“基础”，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是“上层建筑”，这是一个比喻，它形象地表达了三者之间的关系：政治和文化必须建筑在经济基础之上，上层建筑越是辉煌，要求基础越是牢固。颠倒这个关系，就会铸成大错，受到无情地惩罚。从前有个富人，看到另一个富人家的房屋有三层楼，轩敞壮丽，心中很羡慕，马上叫泥瓦匠来造一所同样的三层楼房。泥瓦匠开始打地基，垒石头，建造楼房的最下一层。富人瞧了，心中犯疑，跑过来问泥瓦匠：“你这是造什么房子呀？”泥瓦匠回答：“不是照你的吩咐盖三层楼房吗？”“盖楼房挖沟干什么？”富人又问。泥瓦匠说：“不挖沟哪能打地基盖楼房呢？”富人一听急了，连忙止住泥瓦匠道：“你给我造房子，就得依我的计划，我不要什么地基，只要三层楼房，你还是给我把它先造起来吧。”泥瓦匠一再解释。富人就是不听，结果在楼盖好后不久的一场暴风雨中，楼毁人亡。今天的人没几个像富人那样蠢的，大家都知道，没有地基的楼房一定要倒塌，盖得越高、越大，塌得越快，越悲惨。但是，在社会结构问题上，在经济、政治、文化三部分的相互关联方式上，许多人就不明白三层楼房（上层建筑）要建立在地基（经济基础）之上的道理了，他们也像那个富人一样，只要三层楼房，不要地基，认为政治搞好了，思想搞好了，文化搞好了一切就解决了，经济怎么样无关紧要，甚至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荒谬主张。以道德、法律、教育当做社会根本的人，就是这样的人。林彪、“四人帮”也是这样的人。前者导致了理论上的混乱，后者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我们国家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性，看到了解开社会结构之谜的必要性。

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是社会的基本结构。经济结构是基础，是“历史宫殿”的支柱，是社会的根本。宏观上分析社会、认识历史，从经济结构入手，就不会懵懵懂懂，迷失方向，犯追羊人的错误。。

三、社会发展之谜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通常称为文明史，至今已有五千多年了。

在这五千年中，从原始社会跨越而来的人类，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四种社会形态；采用过刀耕火种、男耕女织、大机器生产和电子计算机控制等多种生产方式；依靠工具，人类延长了自己的四肢，增加了自己的脑力；依靠科学，人类将嫦娥奔月变成现实，将偌大一个地球变成小小的村庄。过去茹毛饮血，如今端坐五星级饭店中央；过去野蛮愚昧，如今一举手一投足，文质彬彬，风流倜傥。真所谓：“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什么力量促成社会的发展？什么因素导致人类的进步？

7. 伊阿宋的力量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伊俄尔科斯国王埃宋的儿子伊阿宋，为得到金羊毛，率领阿耳戈英雄们来到黑海沿岸的科尔喀斯，恳求国王埃厄特斯让他们拿走金羊毛。埃厄特斯对伊阿宋说：“可以，但有条件。我有两只神牛在阿瑞斯草地上吃草。它们有着铜蹄，鼻孔喷出火焰。我用它们来耕种荒瘠的田地。当土块掀起以后，我在地垅沟里种下的并不是农业女神得墨特耳的黄色的谷粒，而是一种可怕的毒龙的牙齿。收获的是人，他们从四面八方向我拥来，但我却以枪矛刺杀他们。我天明驾驶神牛耕种，晚间收获后躺下休息。如果你能在当天完成这样的工作，你便可以带着金羊毛回去，否则是不行的。”伊阿宋同意了国王的条件，在国王女儿美狄亚的帮助下，制服了神牛，耕完了土地，杀死了泥土所生的人们，按时完成国王所要求的一切，最后胜利地拿走了金羊毛。

伊阿宋的胜利，得益于神奇的普罗米修斯膏油。这种膏油是用一种树根的黑汁做成的，树根在高加索山坡的草地上，吸收着从普罗米修斯的肝脏渗滴出来的血液。把膏油涂在枪、剑和盾牌上，枪、剑、盾牌就坚硬无比，什么都不能损坏它们；把膏油涂在身上，身体就力大无比，不会受到刀伤和火伤，却能击败任何敌人。

伊阿宋的力量来自普罗米修斯膏油，人类社会变化发展的最终力量来自生产力。

马克思在研究中发现，人们首先要吃、穿、住，然后才能从事政治、哲学、文学、宗教、科学等活动。这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重要的事实，却又是一个长期为人们所忽视的事实。满足人们吃穿住需要的生产，其每一个进步，都给社会带来深远影响：煤的使用，解决了木材短缺问题，给刚刚兴起的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开采煤矿的需要（主要是抽水需要），使蒸汽机第一次作为动力机被用于生产实践；为了运煤，交通得到长足发展，英国人用大型马车在木轨上运煤，人们称它为“英国煤路”，这是铁路的前身；煤在玻璃工业中的使用，使玻璃由奢侈品变成群众需要的日常消费品；煤用于高炉炼铁，解决了长期困扰英国钢铁工业的难题，大大促进了钢铁工业的发展。众多这样的进步汇集起来，像一股洪流，冲破闸门，奔腾而下，社会翻天覆地变化的时刻就来到了。所以，当人类第一次有意识地耕种土地、播种粮食作物的时候，就是农业文明和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开始的时候，当欧洲

人破天荒第一次有意识地使用蒸汽机的时候，就是工业文明和又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开始的时候。

如果问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从刀耕火种到电子计算机，人类无数的美妙梦想能够变成现实靠的是什么？我们回答，从根本上来讲，靠的是生产力。生产力是人类的普罗米修斯膏油，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的决定力量。

1939年9月1日拂晓，法西斯德国的空军突然入侵波兰，对波兰的政治、经济中心和军事要塞狂轰滥炸。紧接着，德国的摩托化部队越过德波边界，分三路向华沙进逼。从此开始了历时6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蔓延欧、亚、非三洲，先后有60多个国家、占全世界五分之四的人口卷入。无数的村庄和城市变成废墟，数百万犹太人被纳粹赶进毒气室、焚尸炉，几千万人倒在血泊之中。为什么会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呢？一位外国学者认为，完全是希特勒那本《我的奋斗》引起的。希特勒在这本书中，宣扬极端反动的沙文主义、种族复仇主义，使得纳粹分子发动了这场血腥的战争。这位学者接着说，如果世界上开明的政治家们早些读了《我的奋斗》，加以预防，这场世界性的大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一本书的思想能够左右人类的命运，这种观点不对。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它为榨取最大限度的垄断利润，不仅要残酷地剥削本国劳动人民，而且必然要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疯狂地掠夺殖民地和别国人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败国德国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与发展，羽毛逐渐丰满，越来越感到自己的生存空间不利于本国生产和社会的发展，于是便纠集意大利和日本，再次投入了争夺世界霸权、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1929年至1933年发生的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更加尖锐，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斗争，终于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由此可见，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各种矛盾尖锐发展的结果，而在这些矛盾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是帝国主义各国为争夺自己国家生产力发展空间而斗争的一种方式。

20世纪80年代伊始，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一股强劲的改革浪潮。短短十年，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国民经济大大发展了，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了，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农村变了，城市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变了，整个中国社会都变了。连那些仇视社会主义中国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改革正使中国社会腾飞。

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有人从政治、思想、领导者个人的品质方面寻找原因。我们不否认这其中具有合理的因素，但促使中国共产党人锐意改革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工业、农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用仅占地球三分之一的可耕地面积，解决了超过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自力更生研制了原子弹，把卫星送上了太空……但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历史原因，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社会主义制度有巨大优越性，但我们的生产关系还存在一些弊端，使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受到阻碍。当马克思一百多年前向全世界宣告，社会主义一定会战胜资本主义时，他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能够得到更快的发展为基本根据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生产力搞不上去，社会主义就没有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巩固，因此，中国必须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能变。舍此没有第二条出路。

改革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改革的具体措施、方案，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也要以生产力的状况为转移。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推行的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什么？因为我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很低，号称“1007部队”。“1”是扁担，“00”是两只筐，“7”是锄头。在这样的基础上搞人民公社，搞“一大二公”，只能是“大锅饭”、“大呼隆”、“共产风”，必然对生产力起阻碍作用。而联产承包责任制则是适合“1007部队”的好形式。这已为实践证明。

什么样的生产力，要求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力的变化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变化发展，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让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人类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环境污染问题、生态平衡问题日益严重，地球生物圈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导致人和自然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怎样缓解这个矛盾？人们的目光集中在生物工程上，希望依靠生物工程培育出能在沙漠、盐碱、涝洼地里丰产高能的植物，更希望依靠生物工程技术在工厂的生产流水线上直接合成农作物来。我们相信，生物工程能够完成这一使命。但同时也要看到，生物工程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新问题。科学家告诉说，生物工程不仅可以合成粮食，而且可以合成人，并且是根据生产者的意愿合成的具有特殊技能的人，如像电影《第一滴血》中兰博那样特别能打仗的人；像当今美国田径名将刘易斯、鲍威尔那样跑得特别快跳得特别远的人；像《水浒传》里浪里白条张顺那样脚踏碧波如履平地的人。有人建议，将来一些激烈、危险、对抗性强、艰巨、辛苦的活动，就可以专门派这些具有特殊技能的人去做。假如按这些人的建议办，未来社会的人至少将面临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同我们在工厂里合成出来的人是什么关系，是把他们看作我们的同类，还是把他们看作我们的产品？第二，派他们专门从事人类不愿做的激烈、危险、对抗性强、艰巨、辛苦的工作，道德不道德？这些在今天的人看来属于天方夜谭的问题，对未来的人极可能是现实，如同嫦娥奔月等在过去的人看来是天方夜谭的事，在今天的人看来已经成为现实一样，而诸如此类的问题，不光生物工程能够引起，其他科学也能引起。最近，美国工程事业全国科学院的科学家评选出本世纪最近25年来最为引人注目的10项重大工程：阿波罗工程，空中客车工程，光纤工程，卫星系统，微处理机系统，超高速计算机，激光工程，新材料工程，自动化系统，基因工程。认为这10项重大工程对21世纪将有重大影响。在它们的影响下，21世纪的生产关系，21世纪人与人的其他社会关系，21世纪的整个人类社会都将发生重大变化。

生产力不能孤立地存在，它总是与生产关系结合在一起。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只有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时，生产力才能顺利发展，反之，就会受到阻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矛盾。科学的进展，技术的发明，工具的改进使生产力处在不断变化中；而生产关系（如一种所有制形式、一种分配形式）一经建立，就具有相对稳定性；不断变化的东西和相对稳定的东西必然发生矛盾。开始时，生产关系基本适合生产力的要求，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这种基本适合的变得基本不适合，这时候就要对生产关系加以改造，使之适合新的生产力的新的要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由基本适合到基本不适合，经过矛盾的解决达到新的适合，这样一个川流不息、循环往复、不断前进的过程，构成人类社会基本的矛盾运动。

马克思总结人类解决这一矛盾的经验，发现一条社会基本规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按这个规律办事，社会就会健康发展。

8. 社会“助推器”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也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对人类社会来说，这两对矛盾同时存在，相辅相成，都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比较起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更根本些，是社会发展的主动力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基础上产生，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器。

如前所述，经济基础（社会经济结构）指一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这种生产关系确定之后，需要社会在政治法律上给予保护，在思想观念上给予认同。

1842年，年轻的马克思大学毕业，来到《莱茵报》社担任主编。

本来，马克思打算毕业后留在大学从教，由于当时的好朋友鲍威尔被学校当局蛮横地剥夺了教师资格，导致马克思放弃初衷，投入到火热的社会实践中去。

当时社会上流行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和法律是理性、正义的象征，执政者本着理性和正义的精神，依据法律，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马克思在作为记者旁听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时，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莱茵省有大片的森林，它们分属地主贵族所有。当地农民由于破产，生活贫困，林木盗窃问题日益严重。国家为维护剥削者的利益，严加惩罚。但地主贵族仍嫌不够，要求莱茵省议会通过一项法律，把捡拾枯树枝列入盗窃林木的范围，予以法律制裁。在森林里捡拾枯树枝，是德国农民历史上形成的习惯权利，把捡拾枯树枝说成盗窃，等于扼住了农民的咽喉，使他们已经贫困交加的生活雪上加霜，是对农民最低限度的利益的剥夺，根本不公平，根本不合乎理性和正义。然而，这样一个林木盗窃法竟然在莱茵省议会通过并颁布实施了！马克思由此看到，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并不是根据所谓理性原则、正义原则制定的，而是根据生产关系、物质利益制定的；莱茵省议会不可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只能代表并维护控制它支配它的地主贵族的利益。

马克思的发现具有普遍意义。本世纪80年代，某国某地有人提出一项议案：按照财产增收一笔特别税，用以缓解长期以来人们怨声载道的交通拥挤问题。议会讨论五次没有通过，原因在于，当地的巨商富贾反对按财产交纳特别税，认为这“不合理”。当议案改成“按人头交纳特别税”后，第六次讨论一致通过。70年代中，西方某发达国家某个州的人民，对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不堪忍受，他们以大量事实和科学数据向当局表明，环境已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并提交了一项环境保护法规，要求议会表决。但一位州议员提出一项暂缓表决环境保护法规的动议，理由是，如果实施该项法规，该州资本家将蒙受巨大损失，该州的财政收入也将大大减少。议会通过了这项动议，资本家的利益得到保护，而人民群众的利益再次遭到遗弃。这些事例说明，任何上层建筑都是以政治的或法律的形式为自己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不会违背自己经济基础的意志，更不会同自己的经济基础背道而驰。

经济基础不但要求政治法律的保护，而且要求思想观念的认同。即用宣传教育等各种手段，把自己的所作所为说成合理的，提倡一种观点，让人们接受它，并自觉按照它的要求去做。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极力宣扬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因为私有制、资本家个人占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基本占有形式，否定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就否定了私有制的合理性，否定了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合理性。为什么我们国家提倡“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绝大部分归国家和集体所有，既然个人没有生产资料，大家都是国家的主人，就不应只想个人，而应“大公无私”，为每一个和自己一样的国家主人服务，你做的事是为我，我做的事是为你的，大家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后，上层建筑迟早也要发生变化。在经济基础的决定下，上层建筑一旦建立，就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一方面促进它的形成、巩固、完善和发展；另一方面排斥、打击、压制和清除有害于自己经济基础的东西。上层建筑这种反作用在我们国家表现得很突出。我们开展的一次次思想政治活动，如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争做四有新人活动，精神文明建设，对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思想的批判，对革命英雄人物和模范人物的宣传、赞美，对坏人坏事的揭露抨击，要求文学艺术讲究社会效益，反对低级庸俗的作品，人生观教育等等，都是它的具体表现。所有这些活动，目的是一个，扶正压邪，扶对社会主义有益的东西，压对社会主义有害的东西，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要求，协助生产力向前发展。

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它作为社会调节控制设施的作用就是微弱的，它作为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就是无力的。看过电视连续剧《北洋水师》的人，都会在一组镜头面前痛心疾首，忿恨惋惜：中日海军黄海大决战，日军以灵活的战术击沉北洋水师四艘战舰，抗日名将邓世昌也壮烈牺牲，情况对我很不利。这时，我军旗舰定远号用唯一一发榴弹，将敌方旗舰松岛号击成重伤，只要将其击沉，就能一举扭转战局。定远号管带刘步蟾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命令军舰靠近松岛，坚决把它打沉。敌人也看到了危险，几艘军舰拼命靠过来救援。在战机极为有利、稍纵即逝的关头，我方大炮却因炮弹不合规格打不响了。刘步蟾急令：“快用锉挫。”几名水兵冒着敌人的炮火，发疯般地锉着炮弹，他们都很明白，双方舰只离得这么近，谁先开炮，就会击沉对方，因而分分秒秒都关系着生死存亡。一个人倒下了，另一个人继续干，当一名水兵用尽最后气力说“好了”时，整个炮弹已被水兵的鲜血染成红色。怀着悲痛的心情，炮弹装膛了，带着复仇的渴望，大炮瞄准了，“轰”一声巨响，炮弹准确击中敌舰要害——弹药库，日本海军司令伊东痛苦地闭上眼睛：“完了！”然而这枚关系整个战局、用烈士鲜血染红的炮弹，静静地躺在敌人弹药箱上，没有炸！是枚臭弹！黄海大战以北洋水师失败告终。从此，日本海军取得了制海权，打开了通往中国的航道，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黄海大战失败的原因很多，指挥不利，舰队排列阵势错误是一；清朝官员贪污腐败，收受贿赂、炮弹质量低劣，多次击中敌舰要害不炸是一；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庆祝她的六十大寿，致使北洋水师军舰破旧、弹药不足也是一。这些原因概括为一条，就是清王朝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已经腐朽糜烂了。不管北洋水师官兵多么勇敢，结果总要失败；即使这次不失败，炮弹打响了，松岛击沉了，下次也要失败。

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它作为社会调节控制设施的作用就强，它作为社会发展的“助推器”就力大无比。看过电影《英雄儿女》的人，都会被王成的英雄行为感动。他只身一人，带伤坚守阵地，毫不畏惧，充满乐观主义精神。子弹打光了，用手榴弹；手榴弹打光了，他高喊着“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抱起最后一根炸药筒跳进敌人群中。新中国刚刚诞生，美帝国主义就发动了侵朝战争，把战火烧到我们家门口。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在没有制空权、制海权，装备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依靠无数像王成同志那样的最可爱的人，浴血奋战，打死打伤敌人 109 万人，击落击伤敌机一万多架，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抗美援朝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灭掉了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者的气焰，换来了几十年的和平生活。抗美援朝能够胜利，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上下一致，保家卫国，同仇敌忾的决心，有全国人民节衣缩食的大力支持。总而言之，我们有一个政治开明，思想解放，充满朝气，充满活力的上层建筑体系。

有没有一个贤明的制度，常常是一个国家昌盛与否的决定因素之一。“贤明的制度”说的即是上层建筑。所谓“贤明”，就是及时适应经济基础变化的要求，所谓“不贤明”，就是不适应或不能及时适应经济基础变化的要求，“助推器”功率大小，与此适应程度成正比。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也有矛盾。这是因为，第一，新的上层建筑的形成，需要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结束以前，其不完善的地方难免与经济基础发生矛盾。第二，上层建筑一旦形成，就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力量，它对经济基础的反映、服务，要经过许多具体环节，随时可能在某些环节上出现不相适应的情况。第三，经济基础总是在发生变化，已经形成的上层建筑不能马上随之变化，自然也会发生矛盾。

在同一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有不同的情况。在一种新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而产生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是基本适合的，同时存在矛盾，是基本适合中的矛盾；当一个社会处在没落时期，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在生产力推动下要求根本变革，而上层建筑阻碍这种变革时，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基本适合就变成了基本不适合；这时，社会革命就会爆发，旧的上层建筑灭亡，新的上层建筑产生，再回到同经济基础基本适合的阶段。如此循环往复，推动社会不断前进。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有巨大的优越性，但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这主要是由于：（1）历史原因，从旧社会脱胎出来，因而带有某些旧社会的痕迹；（2）客观原因，我们在从事前无古人的事业，缺乏现成的模式和成熟的经验，在摸索中前进，难免跌跤；（3）主观原因，指导思想有错误，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等“左”的一套东西，阻碍我们及时补充、调整、改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合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地方。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解决这些矛盾，才能健康发展，国泰民安。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必须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自觉进行改革。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有效方式，是社会主义社会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是强国富民的有效手段。每一个真心实意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人，都应当真心实意地拥护改革。

9. 变革的杠杆

人类的理想之一是平等。然而，不平等却像魔影一般，追随了人类五千年。

在文明发祥地之一的古代埃及，创造了金字塔的劳动人民过着猪狗不如的凄惨生活。《阿赫托依的教谕》中这样记载着：每一个执雕刻刀工作的工匠都比庄稼汉还累……夜晚他（庄稼人）可以闲下来，但他（工匠）却还得做他双手做不完的工作。夜晚他是燃着灯火的。磨制宝石的匠人须得对每一种硬石加工。当他工作完毕时，他的双臂麻木不仁，全身都精疲力竭。他从早到晚长时间地坐着，他的腿和背都是弯曲的……旅行的商人顺流下航到三角洲去做买卖。当他工作过度，力不能胜时，蚊蚋害了他，沙漠中的蝇子使他处境可怜可惨。最后，还有各种发炎的疾病……纺织作坊的职工的处境比妇女还坏，他的大腿紧贴着肚皮。他吸不到新鲜的空气。假如他没有如数织出一天的布来，他就要挨 50 皮鞭。为了要见一点日光，他必须把食物送给守门人……染布工的手指，就像死鱼那样，发出臭气，他的手不停歇。凉鞋匠根本就差劲，他永远贫穷。他也是很安静的，就像死鱼里任何一条那样安静。他咀嚼皮子。洗衣工在鳄鱼近旁的沿岸洗衣服……人们对他说：“假如你误期送来，就要打你的嘴巴……”

另一方面，奴隶主、地主不劳而获，过着骄奢淫逸，花天酒地，“朱门肉臭”的生活。东汉著名思想家仲长统在《理乱》篇中对“豪人之室”作了如下描述和揭露：他们“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亲族）万计”，为他们贩运货物的车船通达四方，为他们投机经营的机关设置在许多城市；他们的珍奇异宝多到难以数计，“巨室”也堆放不下；他们的牛羊猪群满山遍野，偌大的山谷也承受不了；他们的娇童美妾填满了屋子，歌妓乐队排列在后堂；等待接见的宾客立于门前，车马交错，不敢进去，但又不敢得罪主人而随意离去；他们家里的各种肉食很多，吃不完放在那里发臭，美酒也很多，放坏了也顾不上喝；他们的眼珠一转，别人的眼睛就跟随着探望，脸色一变，别人就得察颜观色，揣摩他正在变化着的心思。

天下穷人一样苦，天下乌鸦一般黑。对不平等现象，我国劳动人民早就有所认识，悲愤地控诉了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而当他们的非人生活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便爆发出不可遏止的怒火：

“鹿死不择音，铤而走险，急何能择？”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在饥寒交迫的困境中，他们向往着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美好社会：

“硕鼠，硕鼠，无食我禾！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为什么不平等？为什么有人穷有人富，一些人受另一些人的奴役？佛教认为，是因果报应的缘故。你在前世做了恶事，种下了“因”，今世就要得到受苦受难的报应，这是“果”。你在前世做了善事，种下了“因”，今世就会得到荣华富贵的报偿，这是“果”。穷人之所以穷，是他前世作恶的结果；富人之所以富，是他前世行善的结果。

佛教的观点成了封建统治者为自己的统治进行辩护的工具。中国历代皇

帝都把自己视作“真龙天子”，“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这一切非人力所为，都是上帝赋予的，是天命，是大运。公元1367年12月，朱元璋夺取天下的军事行动取得决定性胜利，就要登基做皇帝了。在登基前，朱元璋把要做皇帝的意思，祭告于上帝皇祇说：“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从宋朝的大运告终，上帝命令真人降生于沙漠，然后使其进入中国成为天下之主，建立起元朝，其君臣父子及孙统治中国一百多年，今天大运亦终。元朝的土地和人民，引起众多豪杰的争夺，上帝却只赐给我英贤作为辅佐，使我得以戡定群雄，息民于田野，获国土周廻二万里广。这段时间，手下的臣民都说民众无主不行，必欲推我尊帝号，臣不敢推辞，也不敢不告知上帝皇祇。决定在明年正月四日于钟山南坡，设坛备仪，昭告帝祇，请上帝裁定：如果臣可以成为万民之主，告祭的那天，帝祇来临，天空晴朗空气清新。如臣不应成为万民之主，到了那天可烈风异景，使臣知之。”这篇祭告文把元朝的倾覆和自己皇朝的建立，都推到上帝身上，来朝的灭亡，元朝的兴衰，自己明朝的取而代之都是天命。上帝的意志是不可违的，秉承上帝意旨作皇帝的权力自然也是不可违的。朱元璋以及历代皇帝就凭这个上帝命令来统治全国人民，叫人明白违背他就是违背上帝，把神权和世俗政权结合在一起。既然“命中注定”，劳动人民该怎么办？佛教和封建统治者异口同声地说：安于现状，忍受一切苦难，心甘情愿做统治者让你做的一切事情，不要有丝毫反抗，这样，就可以修正果，或升天堂，或享受来世的幸福。

佛教的观点、封建统治者的观点是错误的骗人的观点。穷人的受苦受难，富人的荣华富贵，既不是“因果报应”的缘故，也不是“天命”所定，不平等的直接原因，在于他们分属不同的阶级。列宁告诉我们，在看待社会不平等现象，看待社会的矛盾、纷争、演变时，“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列宁选集》第2卷，第587页）

所谓阶级，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在一定生产关系体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集团。具体说来，（1）这些社会集团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有些占有生产资料，有些不占有生产资料；（2）由于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它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占有生产资料的集团居统治地位，支配控制国家并享有各种特权，不占有生产资料的集团居被统治地位，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常被剥夺基本的权利；（3）由前两点决定，它们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有些集团不劳而获，把大部分财富攫为己有，有些集团日夜辛劳，牛马一般，仅能维持生存的基本需要。在上述三点中，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不同是形成阶级区别的基础，也是阶级划分最根本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标准。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些在历史上存在过的基本阶级，就是根据这个标准划分的。

阶级有其发生发展的历史。原始社会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劳动所获得的产品除了满足最起码的生活需要外，没有任何剩余，因此，人人都必须劳动，没有产生私有制和剥削的可能，从而也没有阶级。原始社会末期，铜器和铁器工具逐渐采用，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出现了剩余产品，为阶级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使氏族内部的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为可能。同时，剩余产品的出现还产生了两个重要结果：第一，战争中得到的俘虏不再杀掉，用剩余产品养活他们，强迫他们劳动，以便剥削榨取

他们的劳动，并使其变为奴隶。第二，促进了产品交换和分工，逐渐产生了财产的私人占有，从而诞生了私有制。所有这些聚合在一起，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两大阶级——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人类社会也由原始社会过渡到了奴隶社会，从此，阶级社会拉开帷幕。

阶级的定义和阶级的产生清楚地表明，阶级实质上是一个经济范畴、经济实体，即特定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地位，产品分配关系）的承担者，是在特定的经济结构中处于特定地位的人们的共同体。“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一伙把阶级看作一个政治范畴、政治实体，甚至看作一个思想范畴、思想实体，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的肆意歪曲。

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无数人们之间的冲突、战争、政变与复辟是它的表现，不同的经济地位和物质利益的对立是它的根源。剥削者占有生产资料，在生产中居于支配地位，残酷榨取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无偿地占有他们的剩余劳动；被剥削者占有很少或完全不占有生产资料，在生产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承受着生产的最沉重负担，上无片瓦，下无插锥之地。由此形成了二者的物质利益上的对立，形成了一个阶级不择手段竭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统治地位，一个阶级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利益状况和屈辱地位的尖锐冲突——阶级斗争。

迄今为止，历史上每一次大的变革、大的发展、大的进步，都是阶级斗争推动的。

公元4世纪30年代，曾辉煌一时的古罗马奴隶制衰落了，社会矛盾极为尖锐，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他们卖子为奴，以女换粮，仍找不到一条生路，被迫揭竿而起。首先爆发的是阿哥尼斯特运动，即农民、隶农、奴隶的联合起义，矛头直指大地主和高利贷者。他们以木棍为武器，袭击大地主的领地，焚烧奴隶名单和债券，使得地主再没一个敢去讨债。接着爆发了弗生提盖伦为首的西哥特人起义和阿拉里克领导的西哥特人起义。前者与瓦伦斯皇帝的军队会战于亚得里亚堡附近，使罗马四万大军全军覆没，瓦伦斯也毙命丧身，起义军乘胜前进，西至阿尔卑斯山，东达君士坦丁堡。后者从巴尔干半岛出发，进军意大利，围攻并占领了被誉为“永恒之城”的罗马，然后迁移到高卢和西班牙，在那里建立了西哥特王国。几百年来，称霸地中海世界的罗马大帝国在波澜壮阔的人民起义和连续不断的蛮族入侵的打击下，终于灭亡了。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西欧奴隶制度的崩溃。从此以后，西欧进入了封建社会，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中世纪。

1789年，资本主义在法国工业和农业中有显著发展，工业生产增加一倍以上，进出口贸易增加了两倍，对殖民地贸易增加了四倍。发财致富的资本家对自己低下的社会政治地位越来越不满意，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波旁王朝则竭力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及其贵族的特权，社会一片黑暗，官吏专横，权贵滥用密札，不经审讯即把拘捕的人投入巴士底狱，弄得群情躁动，人人自危。占人口99%的第三等级同占人口不到1%的第一和第二等级（教士和贵族）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6月30日，巴黎人民上街示威游行，一部分被派去镇压示威群众的士兵同情人民，拒绝接受命令。宫廷为实现武装镇压革命的阴谋，陆续向凡尔塞和巴黎调集军队。12日晚，巴黎人民与军队发生冲突。次日晨，巴黎上空响起革命的警钟，人民拿着短刀斧头涌上街头，战斗更加激烈。在起义人民的攻击下，王军节节败退，一部分士兵也转到革命方面，

到晚上，巴黎的大部分已掌握在革命人民手中，并成立了由资产阶级代表与选举人会议和旧市政府共同组成的常务委员会。这时，在首都的东南部，巴士底狱塔楼上的大炮仍然威胁着整个巴黎、特别是巴黎近郊圣安东工人区。14日，群众包围了这个象征封建统治的堡垒，攻破大狱。至此，整个巴黎被革命势力所控制。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胜利，迫使政权从王室转到制宪会议手中，标志着法国资本主义开端。

至于1917年苏联的“十月革命”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的中国革命，则是无产阶级及其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结果是把历史推向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无庸赘述。

阶级斗争不仅在社会发展的转折关头（质变阶段）起到重大作用，而且在社会发展的相对稳固时期（量变阶段）也起到重大作用。现代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许多权益，如八小时工作制，劳动保护，人身财产保障，社会福利等等，都是无数次示威游行、罢工抗议，甚至流血牺牲换来的，是资产阶级迫于压力作出的让步，绝非他们的恩赐。

基于上述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4页）

注意，马克思、恩格斯这里说的“历史”和“现代社会”，指的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说，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是阶级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而不是一切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和杠杆。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一种历史现象，它不是从来就有的，将来也是要消亡的。社会主义的任务之一就是消灭阶级。无疑，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斗争，但它与以往阶级斗争相比有很大不同：在规模上，不再存在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阶级斗争；在发展趋势上，阶级斗争数量将越来越少，作用将越来越小。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和人在生产中、社会中的地位平等，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是同国内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和国外敌对势力的斗争。所以，社会主义社会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为地夸大阶级斗争的地位和作用，将产生严重的后果。

综上所述，社会发展的动力由三个基本因素组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一定历史阶段上的阶级斗争。它们分居不同的层次。其中，阶级斗争是直接显露于外的表层因素，是我们在阶级社会中经常耳闻目睹的现象；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深一层的因素，国家政权的活动、思想观念的影响等部分过程显露于外，其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则隐藏于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最深层的因素，人们一般注意不到它，然而它却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动力。其他两个因素虽各有自己不可取代的功能，归根结底都是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基础上产生的。把握社会发展动因，注意表层因素固然重要，注意深层因素及其与表层因素的关系更为重要。

四、社会意识之谜

人心变化莫测，最难琢磨。战国时代法家杰出代表韩非曾在《说难》篇中用大量事实说明国君的心思难察：国君要沽名钓誉，你若劝他图利，国君就认为你卑贱；国君贪图厚利，你偏偏劝他图名，他就怪你不懂事；有的国君表面上逐名而内心求利，这你就不好进言了，如果劝他图名，他表面上对你亲近，暗中对你疏远，如果劝他图利，他暗中采纳你的意见，但表面上却抛开你。韩非的揭露惟妙惟肖，入木三分。正因为人心难测，社会上有“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等谚语，有“心不在焉”、“心怀叵测”、“人心不足蛇吞象”等成语和说法。

这里说的“心”，并不是人体中那个推动血液循环的器官，而是指人的头脑、人的精神、人的思想意识或社会意识。难以琢磨的人心，就是社会意识之谜，它曾长期困扰人们，是最奇异、最引人入胜的谜，也是最难解、最折磨人的谜。

10. 撩起面纱

智慧女神常常带着面纱，使人因无法窥视而产生神秘感，进而把她当作神来崇拜。其实，神是不存在的，只不过人们常常把自己最美好的东西集中起来赋予一个崇拜物，才产生了神。智慧女神（如雅典娜）就是早期人类对社会意识崇拜的结果。

社会意识是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是人们社会精神生活中一切意识要素和观念形态的总概括。神话传说、文学艺术、心理情趣、科学、哲学、宗教、道德等等，都属于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的构成极为复杂精细。从其发展的高低层次的角度看，社会意识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

有位朋友到乐广家做客，回去后就得了大病。乐广感到奇怪，便前去探望，问其得病的缘故。朋友说：“前次到你家做客，在你斟的酒中，隐隐约约看见一条小蛇在杯里游动。我很害怕，想不喝，又觉得这样会不尊敬主人，只好硬着头皮喝下去，回到家里，总觉得那条小蛇在肚里爬，越想越恶心，就生了这场大病。”乐广心想，酒杯里是不会有蛇的，可是朋友又分明看见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回到家里，他就在客厅里踱来踱去，忽然看见墙壁上挂着一张青漆红纹的雕弓。他想，是不是这把弓在作怪呢？于是，他马上斟了一杯酒，放在案桌上，移了几个角度，就看见那张弓影投映在酒杯中，果然像条小蛇在游动。乐广马上跑到朋友家，扶着他来到自己的客厅里，问他在桌上的酒杯里看见了什么？朋友惊叫起来：“就是那条小蛇！”乐广再指着墙壁上的雕弓叫他看。朋友看看酒杯，再看看雕弓，恍然大悟，知道杯中的小蛇原来是墙上的弓影，他的重病顿时痊愈了。杯弓蛇影，在这个故事里，朋友所以得病，完全是由某种心理作用引起的。乐广经过一番调查，搞清了问题的原委，消除了朋友的心理障碍，也就把他的病治好了。因心理缘故而不安、而疑惑、而生病的现象，在社会中、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经常出现。它们属于社会心理。社会心理直接与日常生活相联系，是人们对外部世界一种不系统的、不定型的、自发的反映形式，因而是一种低水平的社会意识。

从前，齐国人把老虎和蟒蛇看作不祥之物。有一次，齐景公外出打猎。爬上山头，忽听到一声狂啸，从草丛里跳出一只吊睛白额猛虎；下到山沟里，又见一条水桶粗的青皮蟒蛇盘在岩石上。齐景公心神不定地回到宫里，急忙派人把丞相晏子召来问道：“今日寡人上山见虎，下沟见蟒，这怕是我们齐国的不祥之兆吧？”晏子回答说：“我也听说一个国家确实会有不祥之兆，而且有三不祥：一是有了贤明的人材，而大王不知道；二是知道了却不去选拔，不愿录用；三是虽然录用了却不肯信任。所谓不祥，尽在于此。至于今天上山见虎，那因为山是虎的巢居；下沟见蟒，那因为沟是蛇的洞穴，不能说是齐国的不祥之兆。”宗教迷信盛行人类早期，帝王将相常用做理论，欺骗劳动人民，维护自己的统治。而人才与国家兴衰的关系，从古至今都是人们探讨的主题，所以，齐景公和晏平仲讨论的问题，不属于感性经验的、不定型不系统的、自发的社会心理问题，而属于社会意识形式范围内的问题。社会意识形式是从社会生活中概括提炼出来的一种比较系统的、自觉的、抽象化的反映形式，是一种高水平的社会意识。

意识是人的意识，人是意识的主体。从意识的主体及主体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看，社会意识分为个人意识和群体意识。

林花谢了春红，
太匆匆，
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
相留醉，
几时重？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这是一首即景抒情的小词。词作者李煜，南唐的最后一个皇帝，世称李后主。在位 15 年，沉湎声色，最后国破出降；宋封他为违命侯。不久被宋太宗毒死。李煜政治上昏庸无能，却是一名成绩卓著的诗人。这首词是李煜后期的代表作之一。词的上阕，描写在寒雨疾风的摧残之下，林花凋谢，春去匆匆。字里行间寄寓着词人因感到人生短促、国破家亡而产生的极度悲凉情绪。词的下阕，抒写好景不再的哀愁和人生痛苦的怨恨。全词情调哀怨，意味深长，是作者由皇帝沦为囚徒后个人意识的流露。个人意识是个人的精神世界，是个人独特的社会经历和社会地位的反映，是个体实践的结果。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这首诗是在结束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反动派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渡长江，解放南京的背景下写的。虽然出自毛泽东同志个人之手，却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共同心愿，因而是群体意识的展示。群体意识是因共同的处境、共同的需要、共同的利益而结合在一起

的人们对自己的活动及其与整个社会生活关系的反映。

从是否反映社会的经济及政治特点的角度看，社会意识又可以区分为社会意识形态和不属于意识形态的其他社会意识形式。

龚半千是清代画派中所谓金陵八家之首。针对当时社会上贫富极大悬殊的现象，他曾画了幅财神图。画面表现了一个穿红袍的财神，脚踏着两个元宝走路。从这幅画上，人们一望便知，作者是在讽刺当时社会上那些为富不仁者寸步不离钱财；同时，他又为自己的穷朋友们鸣不平，因为他们贫无立锥之地，简直寸步难行。艺术本身属于上层建筑，这幅画所表现的又是作者对社会不公的不满与愤恨态度，是作者对当时社会经济形态以及由经济形态所决定的政治制度的自觉反映。这种反映社会经济与政治特点的东西，虽然是幅画，但属于社会意识形态。

唐代著名小说家苏鹗在《杜阳杂编》中记载的一件事情则属另一种性质。唐宣宗大中年间，即公元9世纪中叶，日本王子访问中国，献给唐皇许多礼品。唐宣宗设宴款待日本王子，并且演出百戏杂技，欢迎贵宾。日本王子擅长围棋，要求与中国棋手比赛。唐宣宗指定了第一流的棋手顾师言与之对垒。双方各下了三十三着棋，不分胜负。顾师言使出一个绝招，即所谓“镇神头”的一着棋。日本王子估计自己赢不了，便打听顾师言是第几流的棋手。在旁观棋的唐朝官员骗他说是三流棋手。王子要求见第一流的。那个官员答道，必须赢了第三流的才能见第二流的，赢了第二流的才能见第一流的。日本王子长叹一声说：“小国当然不如大国。”推枰认输了。这个故事中的那个唐朝官员说假话，摆架子，有些狡黠，对邻国贵宾的态度不太友好。但他和日本王子的对话没有涉及社会经济与政治问题，这种不反映社会经济与政治特点的意识，不是社会意识形态，而是社会意识形式。

外观社会意识，混沌一团，像个黑洞。走进来，撩开面纱，其主要构架便显露出来：作为社会精神现象总概括的社会意识，主要由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个人意识和群体意识、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式组成。只是它们的表现要复杂得多。

11. 愚公之谷

齐桓公围猎，追逐一只梅花鹿而跑进怪石嶙峋的山谷之中。一老翁从路边经过。齐桓公问道：“喂，老翁，这叫什么山谷？”老翁答道：“愚公之谷。”齐桓公觉得奇怪：“为什么叫愚公之谷？”老翁回答：“因为我住在这儿，就用我的名字称之。”齐桓公把老翁上下打量一番，说：“看你的模样十分精明，怎么会叫愚公呢？”老翁回答：“请允许我慢慢说。我养了条母牛，生了头小牛。我辛辛苦苦把小牛喂大，牵到集市卖了，买了匹马驹回来。谁知乡里有个恶少闯到我家说：‘你家养的是母牛，怎么会生个马驹？一定是偷来的。’不由分说，就把马驹牵走了。周围的人听说了，都说我愚，故而叫我愚公。”齐桓公听罢哈哈大笑：“你这老头果然愚蠢，哪有这样便便宜让别人把马驹牵走的？”第二天上朝，齐桓公把这件事当笑话讲给丞相管仲。管仲听罢，肃然变容，整整衣冠跪倒在地。齐桓公急忙问道：“这是何故？”管仲沉痛地说：“那个老翁一点也不愚蠢，而是我们当政者愚蠢啊！假使尧舜在上，法制严肃，哪会发生诈取别人马驹的事情？即使有，那老翁也不会给他。而现在，老翁知道官吏舞弊，刑法混乱，即使告官也没有

用，只好把马驹交给恶少。请大王重修法政。”

在这里，老翁说的话是表象，表象背后隐藏着官吏舞弊，狱讼不公，故而恶少敢明火执杖强抢他人财物的本质。邻人只看到表象而称老翁愚公，齐桓公听罢老翁陈述，把它当作笑话，也说老翁愚蠢，都没看到老翁言论（意识）背后所反映的社会存在状况这一本质。愚公之谷这个成语，就是告诉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具体说，就是透过言论、思想和意识，把握决定它们产生的那个社会存在。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就是社会意识的本质。

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首先，社会存在是人的意识赖以产生的充分必要条件，人的意识须臾不能离开社会、离开社会存在。

本世纪 20 年代，美国社会学家 K·戴维斯曾报告过两个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的情况。

安娜是一个私生女。从出世那天起，外祖父就把她关在顶楼上的一个房间里，不许她见人。当人们发现她时，她已经 6 岁了，但不会讲话，不会走路，不会使自己保持清洁，也不会自己用刀叉吃饭。她毫无感情，也没有一点表情，对别人丝毫不感兴趣，以至于人们还以为她又聋又哑。4 年半后，她死了。死前她学会了一些词语，也学会摆积木、穿珠子、洗手、刷牙和抚爱洋娃娃，达到一个两三岁的孩子的社会化水平，但从未能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

伊莎贝尔，当她被发现时已经 6 岁半了。她也是私生女，出生后和她聋哑的妈妈一起被外祖父关在一间黑屋子里，母女之间完全靠打手势进行交流，她没有机会说话。伊莎贝尔被外界发现时，她对待别人，尤其是男人，简直像一头野兽。最初人们以为她耳聋，因为她似乎听不见周围的声音，自己也只会发出一种奇怪的尖叫。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她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迅速地通过了一般儿童从 1 岁到 6 岁的学习过程。她在 8 岁半时，智力的发展显然已达到正常儿童的水平，并能和其他儿童一起上学。

从以上两个事例可以看到：第一，由于安娜和伊莎贝尔出生后就与世隔绝，离开了人的社会环境，被严密地封闭起来，所以她们没有感情、没有语言、没有任何真正意义的人类意识。第二，伊莎贝尔生活在社会中后，才达到了正常儿童的智力水平，才能够上学。第三，伊莎贝尔能够迅速恢复正常人的意识，一个重要原因，是她和妈妈生活在一起，和妈妈进行手势交流，尽管妈妈又聋又哑；而安娜所以恢复得极慢，至死不能说一句完整的话，是因为她被关闭期间始终是一个人。第四，以上三点从正反两方面说明，社会存在对于社会意识的产生发展绝对不能缺少。

其次，社会环境不同，人的思想、观念和意识也不同。

中国古代大思想家墨子有一天经过一家染坊，看见有几个染匠正在把一束束丝绢丢进一口口染缸里。他沉思了一会，长叹一口气说：“这雪白的丝绢，丢进黑水，就染成黑色，丢进黄水，就染成黄色，陆续投进五种染料，丝绢就变成五彩色。染料一变，丝的颜色跟着变，所以，染色的时候不可不谨慎。”

人的意识的形成也是这个道理。社会就像染缸，人的意识就像丝绢，在

不同的环境里，人们的意识会很不一样。例如，皇宫里的人所想的，就与茅草棚里的人不一样。春秋时期，有一年数九寒冬，北风呼啸，鹅毛大雪搅得天昏地暗，连续三日不停。齐景公裹着轻软名贵的银狐皮袍，坐在温暖如春的画阁里欣赏歌舞。旁边守着烧得通红的炭炉，案上摆着山珍海味，玉液佳酿。几杯酒下肚，景公额头沁出薄薄一层汗水。丞相晏子进来求见。景公对他说：“今年真怪，大雪连下这么多天，却无一点寒意。”晏子问：“天气真不冷吗？”景公微笑。晏子接着说道：“我听说古代贤明的君主，肚子吃饱就会想到百姓的饥饿，身上穿暖就会想到百姓的寒冷。可是君王却不知道这个道理啊。”是的，坐在皇宫里的齐景公的确不知道，此时，齐国的许多百姓正啼饥号寒，诅咒着这恶劣的天气和不公的世道，为逃避冻尸饿殍的命运而苦苦挣扎。

第三，生产方式构成社会存在的主要内容，生产方式是物质生产的社会形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生产方式怎样，直接决定人们的思想，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人们的思想也要随之发生变化。

孔子的学生子贡，姓端木，名赐，春秋时卫国人，据说很有口才，曾经做过卫国和鲁国的国相，访问过许多国家。有一次，子贡访问楚国，回来时又准备到晋国去，经过靠近汉水南岸的一个地方，看见一个老头正在灌溉土地。他的灌溉方法很落后，先开好一条通到井底的坡道，然后抱着一个水瓮，一步步走到井下，取了水，再抱到田里去浇。这种做法费力很大而功效极低。子贡对他说：“老人家，您为什么不用汲水工具来灌溉呢？有一种叫做‘桔槔’的工具，用它来灌溉，一天能浇一百畦，又快又省力，您难道不知道吗？”老头听了，很不高兴，勉强笑道：“谁说我不知道！但是我不愿用那种玩艺儿。因为改用机械，就要改变方法，我的心思精神也要随之改变，我原来一贯纯正素白的胸怀也就要保不住了，很可能要滑到邪道上去。我坚决抱一守白，不赶时髦！”

老头安于拙陋、不求改进的思想是愚昧可笑、保守落后的；老头变换了工具和方法就会走上邪路的认识也是错误的；但他看到生产方式变，人的心思精神也要随之改变，仅就这点而言，却是正确的。春秋时如此，今天仍然如此。

50年代至70年代，“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我国人民普遍接受的思想观念和身体力行的生活准则，灯光下补衣服、缝袜子的形象，常令人联想起含辛茹苦的母亲和慈祥仁爱的奶奶。在当时情况下，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生产工具和方法落后，人们这样想这样做有其合理性。但是今天，这种观念已经为人们放弃，尤其年轻人，几乎完全抛弃了它，穿着补钉衣服不再是一种光荣，而是一件令人羞愧、甚至感到耻辱的事情。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因为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化纤、尼龙、维尼纶大量出现。为什么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化纤、尼龙、维尼纶等大量出现？因为有了现代化的企业，采用了现代化工艺流程和管理模式。所以，生活水平的提高还只是表象，直接决定人们思想及其变化的是生产方式。

第四，个人阅历的深浅对个人意识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个人阅历就是个人在社会的风风雨雨中亲身见过、听过或做过的事情的经历。个人阅历是一种个人生活、个人实践，是个人社会存在的具体表现。一般来说，个人阅历的深浅同个人意识的发展水平是成正比的，个人阅历浅，知识才能就少，个人阅历深，知识才能就多。所谓“见多识广”，就是这个

道理。

宋代著名散文家苏辙，治学严谨，文学成就相当高。一次，有人去向他请教成功的秘诀，他回答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的意思大家都很清楚，无需多谈。“行万里路”就是要增加个人阅历。苏辙感到，自己过去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接触的只是乡里之人，所见也不过数百里之广。所以，他在19岁以后的数年间，毅然外出周游，“求天下奇文壮观，以知天地之大。”他过秦、汉的古都长安、洛阳，游览名胜古迹；到终南山、嵩山和华山，领略这些名山的雄伟险峻；去黄河之滨，观察河水汹涌奔流，一泄千里的气势。在游历山川名胜的时候，他追忆起“万卷书”中所讲的古人古事，浮想联翩，咏叹历代豪杰们创立的功业。苏辙来到当时的国都开封，看到皇宫的富丽堂皇，看到粮仓府库，城池园林的丰盈与广大，才知道天外有天，是自己的家乡所无法比拟的。在开封，他有机会见到了欧阳修等一代文豪，亲耳聆听他们的高论宏议，得到他们的指点，心情非常激动。为此，他曾深有感触地说：“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

周游数年之后，苏辙回到了家乡，进一步钻研文章，终于成为当时名震文坛的大文学家，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增加个人阅历，说到底，就是增加个人与社会的接触和个人对社会的了解。苏辙的事迹告诉我们，读万卷书是重要的，行万里路同样是重要的。人们对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往往感受最切、认识最深，因而，一方面注意读书学习，另一方面注重增强个人阅历，多了解社会、认识社会，才可能做大文章，干大事业。

总之，一切社会意识，无论其内容正确与否，都可以在社会存在中找到其产生的根源，那些荒诞、虚假、错误的观念和意识形式，只不过是社会存在的虚幻、歪曲、颠倒的反映罢了。“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社会意识的重大变化，归根到底是由社会存在的变化决定的。随着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的变化，人们的社会意识也会或快或慢地发生变化，改变自己的内容。

12. 超前滞后

曾经有同学问：共产主义思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提出来的，无数革命者都高喊着：“为了共产主义”的口号，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今天，距离共产主义社会还有漫长的道路，这种奋斗还在继续。为什么在没有共产主义社会存在的条件下，人们会产生超前的、自觉的、系统的共产主义思想呢？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早在1949年就推翻了包括封建主义在内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为什么直到今天一些人头脑中仍存在着男尊女卑、宗法等级观念、家长制、一言堂等落后于时代的封建思想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还可以提示很多。回答这类问题，涉及社会意识的一个重要特点——相对独立性。

所谓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是指社会意识在反映社会存在的同时，还具有自身的能动性和独特的发展规律，它的发展同社会存在的发展并不总是保持着一致和平衡。不懂得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就解释不了社会意识超前滞后的现象，不可能真正理解社会意识的性质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也不可能真正理解人类历史。

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意识发展变化与社会存在发展变化的不完全同步性。社会意识有时落后于社会存在并阻碍其前进，有时又预见到社会存在的未来趋势，推动其发展。

报载：“包产到户 1979 年就在贵州上山下乡了，时经 8 年，这里每年还要调进十几亿斤粮食，尚有 30% 地区的人们不得温饱。”

“虽然经济是落后的，但这里的文化却精彩迷人。有人计算过，把贵州各民族节目汇集起来，居然 365 日天天有节目。蜡染、地戏、侗寨鼓楼、苗族‘四月八’……璀璨斑斓，扣人心弦。”

“尽管穷，但踏入每个村寨，看到的却是安贫守旧、知天达命的笑容，主人不会因为草房昏暗一片而感到窘迫；节日不会因为穷而不过，哪怕把仅有的牲畜和救济款花完。赶场名目繁多，但这似乎只是男男女女交际往来的准节日，在这幅浓郁的风俗画上总难免涂上一点市场交换的色彩。‘经济人’在这里是受到鄙视的，省内成千上万劳力剩余，却将近 10 万个劳务空缺拱手让于‘川军’，因为那些活儿太‘贱’。”

“经济的发展往往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但这里经济的利剑常常却折服于传统文化的盾牌前。紫云县某村寨 15 户 63 口人，长年住在暗无天日的山洞，政府盖了新房动员他们迁居，还用大轿车送他们上贵阳参观，可回来后 63 人又悉数回到山洞，并不惊羨那种精神文明。榕江县一位少数民族青年参军后回乡，使用钢笔记帐，立即被视为叛逆遭到冷落，不得不甩掉钢笔，结草刻木记帐。”

西南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支奇葩，对它完全否定是错误的。但显而易见，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中肯定存在某些阻碍经济成长的因素，它们和过去某个时代环境相一致相吻合，与今天社会发展的要求不协调相矛盾。这些很久以前形成的文化因素现在仍然存在，显示了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社会进一步的发展将对这些因素造成强烈的冲击，逐步克服它们，则显示了社会意识终究要依赖社会存在。

第二，社会意识的发展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

并非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社会意识的各个部分或每个方面的发展水平也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社会意识的各个部分或每个方面的发展水平也低。历史上有许多经济落后的国家，在社会意识的某个领域却超过了经济上先进的国家，例如，18 世纪末法国的哲学和政治思想超过了当时经济先进的英国；18 和 19 世纪经济上落后、政治上分裂的德国产生了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并孕育了马克思主义。

近十几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一项调查表明，从五六十年代过来的人，有两点深切感受：其一，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提前实现翻一番，正朝着“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快速前进；西装、猎装、运动装，彩电、冰箱、洗衣机，这些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东西，如今已走进千家万户寻常人家。其二，痛感人们道德水准下降，怀念向往五六十年代的社会精神风尚。

经济发展和道德之间的关系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应简单而论。但不可否认，在我们国家经济起飞的同时，的确存在道德水准下降的问题。某大学一位青年教师向我们讲述他亲身经历的两件事，颇能说明问题。

“1965年，我上小学三年级。有一次，父亲生病，我到单位替他领工资。乘公共汽车回家的路上，正想着怎样向父亲要五分钱买冰糕吃，突然听到身边有人厉声喝问：‘你干什么！’回头一看，一个30多岁的叔叔正抓着一个人的手腕，那人20多岁，一脸惊恐，手里拿着个纸包。那正是我刚替父亲领的工资。这时，汽车恰好到站停车，小偷乘人不备，一拳打在叔叔脸上，跳出车门就跑。叔叔鼻子破了，满脸是血，他毫不犹豫，大喊一声：‘抓小偷！’跳下车去就追，车上其他许多人也一齐下车追了过去。街上的行人听到‘抓小偷’的呼喊，都围了上去，小偷没跑几步就给抓住了。晚上，回到家里，我把事情讲给父亲听，父亲对我说：“长大以后，要向那个叔叔学习。”

“1990年，有一天我乘公共汽车外出办事，忽然看见一个小偷在偷一位乘客的东西。那位乘客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衣着时髦。他已感到有人在偷自己的东西，下意识地用手护着衣服口袋，但却不敢吱声。我连忙大喝一声：‘你干什么！’谁知小偷抽回手来反问我一句：‘你干什么？’‘你为什么偷人东西？’‘我偷谁的东西啦？’‘偷他的。’我指着那小伙子说。‘我偷你的东西了吗？’小偷问小伙子。我满心以为小伙子会说‘偷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扭送到公安局去，至少也得让他知道不能这样明目张胆干伤天害理的勾当，谁知小伙子摇了摇头。这下小偷气焰上来了，冲着我挥拳就打，边打边骂：‘你这混蛋，让你诬赖好人！让你栽赃陷害！’我被打得鼻口流血，车上的人都在看着，没一个管的，那小伙子也不知躲到哪儿去了。车到站，小偷骂骂咧咧地下了车，扬长而去。后来我把这事也原原本本告诉了父亲，他沉默了半晌，叹口气说：‘唉，以后别管闲事了。’”

明目张胆偷东西，无人敢管，这类在五六十年代绝不可能发生的现象，在今天却绝非一件两件。它产生的原因很复杂，这里不去分析，我们想指出的是，它说明社会意识的发展同社会经济的发展之间的确存在不平衡。不能以为经济发展了，其他也就都好了，必须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克服社会丑恶的现象，清除人们错误的观念，才能保证社会全面健康地发展。

第三，社会意识的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它必须继承前人提供的思想材料和业已取得的成果，不可能割断历史。

南齐画家毛棱，河南省原阳县人。他父亲毛惠远、叔父毛惠秀，都是有名的画家。惠远善于画马，也善长人物画，与善画仕女的刘瑱并称为“当代第一”。同时代的绘画评论家谢赫很赞赏他的艺术，说他绘画体制完备，想象力丰富，画面结构布局更很少有人能和他相比。惠秀的绘画也非常卓越，技术熟练、高超。毛棱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生长，从小就得到父亲和叔父的教导，绘画方面造诣很深就不难理解了。除了自己的努力外，不断得到父亲和叔父的指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或许有人在才能上不比毛棱差，只因没有毛棱“家传”那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也就不能在绘画上取得毛棱那样的成就。而毛棱的“家传”，他得到的指点和教诲，实质上就是一种继承关系。因此，能否继承前人的成果，对一个人事业的成功极具影响，这已为古今中外文化艺术界、思想界的无数事实证明。牛顿说得好：“我之所以比笛卡尔看得远些，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德国伟大诗人歌德说：“我们全都要从前辈和同辈学到一些东西。就连最大的天才，如果想单凭他所特有的内在自我去对付一切，他也决不会有多大成就。”唐代文豪韩愈则用“业精于勤，荒于嬉”告诫人们，继承前人不是件容易事，倘若不刻苦钻研，勤奋努力，也将一事无成。

除以上三点，社会意识本身还具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特性。不仅某种社会意识形式内部各种因素之间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哲学、政治法律思想、宗教、道德、艺术、科学等不同社会意识形式之间也存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社会意识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存在，突出了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在某些场合，若不从社会意识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入手考虑问题，就不能理解和把握真理。

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社会越发达，社会意识中积累的思想材料越丰富，人们的思维能力越高，人们实践活动的自觉性越强，拥有实现思想的物质手段越多、越有效，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表现就越明显、越突出。

正确认识社会意识，既要反对把它看作脱离社会存在绝对独立的唯心主义，也要反对否认其相对独立性，把社会意识看作只能跟在社会存在背后亦步亦趋的机械唯物主义。

13. 尺短寸长

“尺短寸长”这个成语，是由“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简化而来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出自《楚辞》的《卜居》，大意是说：战国时期楚国政治家、诗人屈原被流放后，仍然忠于祖国和人民，可是他没有办法回到都城，心里很烦乱，就去请人卜卦，并向那位卜卦先生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例如说：“宁肯说真话而得罪人呢？还是追求富贵而糊涂地混日子呢？宁肯昂然不屈以保持忠贞呢？还是畏狼怕虎，献媚讨好去趋奉奸邪之徒呢？宁肯同天鹅一起比翼高飞呢，还是跟鸡鸭们去互相争食呢？”他叹道：“咳，这个世界如此污浊不清，我该怎么办呢？谁又能了解我呢？”卜卦先生说：“对不起，你这卦我没法卜。‘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卦也有不准，神也有所不准；我不能解决你的疑问！”

“尺短寸长”的意思是说：尺固然比寸长，但与更长的相比，它就显得不够；寸固然比尺短，但与更短的相比，它却显得有余。长有它的短处，短有它的长处。任何人、任何东西、任何事情，都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各的短处。

在社会生活中，社会的物质方面、社会经济、社会生产力固然是重要的，社会的精神方面，社会意识、思想道德等同样不能忽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人们的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社会存在有自己的短处，社会意识有自己的长处，它常常以摄人心魄的独特方式起到其他任何东西起不到的作用。请看两例：

例一，孔子的学生曾子（曾参）知书达礼，是个品行高尚的人。曾子住在费城的时候，那里有一个和他同名同姓的人，也叫曾参。有一天，那个曾参杀了人，犯了案。人们误传，以为是曾子杀人了。有人赶紧去给曾子的母亲报信。曾子的母亲正在织布，听了这个消息，毫不在意，她说：“没有的事，我的儿子不会去杀人。”过了一会儿，又有人慌忙来说，曾子闯下大祸了。曾子的母亲还是不信，不慌不忙依旧织她的布。又过一会，第三个人跑来，给她带来同样的消息。这次，曾子的母亲信了，她连忙扔下手中的梭子，爬墙而逃。明明是一句谣言，由于再三传播，竟然让人信以为真，即使是曾子那样的贤人，也被人怀疑，即使是对曾子十分了解的母亲，也相信别人的

怀疑，可见流言蜚语力量之大。

例二，一个老翁和他的孙子在集市上卖完货回家，孙子骑在驴上，老翁跟着走。路上的行人责备小孩不懂事，说不该让老人步行。于是老人骑驴，孙子走路。一会儿，旁人见了又说老人心狠。老人忙将孙子抱到驴背上，两人合骑一头驴。又走了一段路，有人说他们对驴子太不爱惜了，于是他们都下来走路。可是又有人笑他们傻，放着现成的驴子不骑。最后老人无可奈何地叹息道：“看来我们只剩一个办法了，就是两人抬着驴子走。”这样一来更糟糕了，人们纷纷议论：“有两个神经病，人不骑驴，驴骑人。”本来，无论孙子骑驴、老人骑驴，都是正常的，可众人一说，就没了主见，以至弄到最后怎么做都不行了！少年朋友们可能会说那爷俩缺心眼儿，其实，这种事在我们周围经常发生。

对社会意识的独特作用要作分析。

首先，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维护作用。1938年，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处在十分艰难的时刻，加拿大共产党党员、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委托，率美加医疗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怀着慈母般的心肠，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忘我工作，以高超的医疗技术，救治了无数八路军伤病员，并在极短的时期内培训出大批医务工作者。1939年冬，白求恩同志在抢救伤员时手指被刀切破，不幸中毒，终至不救。毛泽东同志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号召人们学习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指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21页）半个多世纪以来，这种精神鼓舞了几代中国人，他们学习白求恩，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的热忱，大大净化了人与人的关系，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其次，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破坏作用。1978年11月18日，在南美洲的圭亚那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大惨案，920人集体自杀。自杀者是美国“人民圣殿教”教徒。该教会创立于1953年，教主名叫琼斯。教徒们在教主的欺骗下从美国来到圭亚那的一片森林中，过着奴隶般的生活。这个教派有严厉而奇特的教规，入教时，每人要准备好一份“自杀遗书”，要绝对服从教主的命令。教主经常向教徒们宣传世界末日即将来临，鼓吹自杀才是“圣洁之死”，并强迫教徒们进行集体自杀演习。美国众议员瑞安来此了解了这一教派的黑幕。琼斯下令杀害了瑞安及其随行记者，然后召集教徒开会，宣布说：“圭亚那的军队马上就要开来了，我们必须庄严死去。”他下令教徒排好队，每人领一小杯含有氰化物的果汁，饮毒自杀。有的教徒在饮毒的时候说道：“今夜我们都将倒下死去。但明天他（指教主）就会使我们复活。”琼斯最后也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件事发生在科学和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美国社会，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然而它毕竟是事实。

社会意识的维护作用和破坏作用从性质上讲，可分为先进的和落后的两种。上面两个事例中，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是进步的，“人民圣殿教”精神是落后的。但这不是因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有助于维护社会存在才是进步的，“人民圣殿教”精神对社会存在起破坏作用才是落后的。实际上，并非每一种对社会存在起维护作用的社会意识都是先进的，也非每一种对社会存在起破坏作用的社会意识都是落后的。判断一种社会意识是先进的

还是落后的，主要取决于它是促进加速社会发展，还是阻碍延缓社会发展。按照这个标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虽然对资本主义社会起破坏作用，却是先进的；中国封建时代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虽然对封建社会起维护作用，却是落后的。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所以有反作用，奥秘在于，社会历史上的一切都是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创造的，而人的活动是自觉的，在思想、观念、意识支配下进行的，社会意识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层面对个人、群体、国家、民族产生影响，从而对社会起到调节控制作用。人总要有点精神，没有一点精神，即使物质生活再优越，也会陷入颓废、苦闷、惶惑之中，失去人生乐趣和意义。什么精神？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头悬梁、锥刺股，奋发进取？还是骄奢淫逸，阿谀奉承，低三下四，不思进取，叶公好龙，斥鷃笑鹏？这是要由人们自己选择的，这是要引导人们去加以选择的。既然社会意识反作用的性质取决于社会意识本身的性质，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用符合社会进步潮流的先进思想武装人们的头脑，反对和清除封建的、迷信的、资产阶级的各种错误观点，就变得极为必要。

精神文明建设要立足于牢固的物质文明基础上。中国古代哲学家荀子讲述过一个寓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南方有一种名叫鹪鹩的鸟，用羽毛做巢，还用发丝编织起来，但却把它托在芦苇穗上。大风一来，芦苇被吹断了，鸟巢随之而掉下来，鸟蛋打破了，小鸟也跌死了。鸟巢并不是不牢固，而是所托的芦苇太脆弱了啊！”这个寓言，含义深刻。没有根基，所建立的一切，无论多么华丽漂亮，都是不牢靠的，迟早要掉下来，跌得粉碎。在物质文明基础上建设精神文明是一条原则，遵循这条原则，精神文明建设才能成功。

五、社会主体之谜

主体是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承担者。社会历史中的一切活动都是人来承担的，人是社会的主体。

社会主体之谜就是人之谜。人之谜也常被称之为‘斯芬克斯之谜’。

斯芬克斯是古希腊神话传说中巨人堤丰与妖蛇厄喀德那的女儿，她有美女的头，狮子的身子。斯芬克斯整日蹲在一座悬岩上，给过路的人提出各种隐谜，倘若他们猜不中这隐谜，她就将他撕成碎片并将他吞食。无数人遭此灾难，连国王的儿子也未能幸免。国王愤怒了，昭示天下：谁能除掉这恶怪，就可以获得王国并娶他的姐姐为妻。俄狄浦斯来到这里，自愿解答隐谜。那怪物决定以一个她认为不可能解答的隐谜来为难这个勇敢的外乡人。她说：“在早晨用四只脚走路，当午两只脚走路，晚间三只脚走路。在一切生物中这是唯一的用不同数目的脚走路的生物。脚最多的时候，正是速度和力量最小的时候。”俄狄浦斯听完这隐谜，微微一笑，好像全不觉得为难。“这是人啊！”他回答说，“在生命的早晨，人是软弱而无助的孩子，他用两脚两手爬行。在生命的当午，他成为壮年，用两脚走路。但到了老年，临到生命的迟暮，他需要扶持，因此拄着杖，作为第三只脚。”俄狄浦斯回答完全正确。斯芬克斯因失败而感到羞愧，一气之下，从悬岩上跳下摔死。

神话中，俄狄浦斯解开了斯芬克斯之谜。现实中，人们竭尽全力拆解，或者把人看作生物的人、自然的人，或者把人看作精神实体、理性的存在物、符号的存在物，或者把人看作政治动物、法律动物。虽有一些正确的地方，总的看都没有揭开谜底。直到马克思出现，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说明了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社会主体之谜才算揭开。

14. 舍末逐本

人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没有人就没有社会没有历史。

这里所说的人，不是生物的自然的人，而是社会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不是作为精神实体的人，而是从事物质生产等项活动的人。社会的、现实的、从事物质生产等项活动的人，他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首先，人是社会的人。

人之为人，具有自然性、生物性，他是一种最高级生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不仅存在着新陈代谢、发育、遗传等生命形式的全部特点，而且要工作劳动、吃穿住行。生物或自然属性是人和人类社会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没有这种属性，就不会有人和人类社会。但是，人的本质并不在于他的生物性、自然性，而在于他的社会性。这是因为，人的生命活动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进行的，都要采取一定的社会形式。例如，动物饮食，靠大自然恩赐，见到了就吃。人的饮食，首先要和他人共同劳动，进而用劳动所得（货币）在市场上与他人交换，然后在一个时间（如中午）、一个地点（如家里）、一些人（如家人）围坐在一起共同进餐。离开劳动、离开交换、离开人与人之间某些固有的关系，人的饮食无法进行。

实际生活中，人们衡量评价一个人采用的标准是社会标准，而不是生物标准。例如，人们不会因为一个人体壮如牛、力大无比就说他是好人，也不

会因为一个人单薄瘦小、缚鸡无力就说他是坏人。是好是坏完全根据他的思想品德、举止行为来判断。离开了思想品德、举止行为等社会标准，进步落后没有了，伦理道德没有了，罪与非罪没有了，人和动物也就没法区别了。

人的思想品德、举止行为如何，同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有关，是该社会环境的产物。战国时代儒家著名代表人物孟子的成长过程，就是这方面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事例。孟子名轲，山东邹县人，号称“亚圣”。小时候，孟子的母亲为了把他培养成人，选择一个好的生活环境，曾经连续三次搬家。汉朝刘向的《列女传·母仪》这样记载：孟母带着幼小的孟子，起初住在一所公墓附近。孟子看见人家哭哭哀哀埋葬死人，就学着玩。孟母说：“我的孩子住在这里不合适！”于是立刻搬家，搬到了集市的附近。孟子看见商人自吹自夸地卖东西赚钱，又学着玩。孟母说：“我的孩子住在这里也不合适！”于是又立刻搬家，搬到了学堂的附近。这时，孟子学习礼节和要求上学了。孟母说：“这里才是适宜于我的孩子居住的地方！”于是就在那里住了下来。三迁之教，传为佳话，孟母由此成为教子的楷模，历代为人们所赞颂。今天，人们来到孟庙的孟母三迁祠碑前，仍不免肃然起敬，为孟母伟大的母爱精神所感动。孟母三迁，既说明对待子女要有正确态度，又说明社会环境对人成长至关重要。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处在什么环境，交什么朋友，就会产生什么思想，形成什么素质，继而显示什么样的举止，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儿童如此，成人同样如此。马克思只能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不能产生在封建专制社会。因为他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他能揭示资本主义的矛盾，指出它灭亡的趋势；也因为他产生在资本主义社会，决定了他不可能对社会主义建设有详尽具体的指示，需要后人来不断认识、补充和发展。所以，人是怎样的，是由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环境决定的。

其次，人是现实的人。

所谓现实的人，就是在特定的社会（如当代中国）特定的条件（如改革开放）下生活并活动的人。现实的人同抽象的人相对立。所谓抽象的人，就是否定抹杀不同社会、不同条件下，具有不同社会地位、社会作用、社会关系的人们的差别，把他们看作一样的——都是人。按照这种观点，原始社会的人和现代社会的人没有区别，都是人；诸葛亮和蒋介石没有区别，也都是人。不分时间、地点、条件把人看作一样的，显然是错误的。抽象的人只在梦幻中想象中存在，现实中不存在。而梦幻中想象中的事情不能据以为信。

有个姓淳于名棼的人，喜爱喝酒。一天，他在门前一棵大槐树下喝得烂醉。两个朋友把他扶进屋去，让他躺一会。这两个朋友就在床边一面守候，一面洗脚。淳于棼糊里糊涂地睡着了。恍惚间看见两个使臣走进来，说是奉大槐安国国王之命，特来邀请。于是出门登车，车子向大槐树根部一个树洞直奔而去。一进洞，只见晴天丽日，山川旷野，城郭村庄，乃是另外一个世界。淳于棼进到王宫，见到国王，当即被招为附马，并被任命为南柯郡太守。到了南柯，上任以后，一切都很顺利，不知不觉就过了30年。由于政绩优良，全郡百姓极为拥戴，国王也很器重他。这时，他已有五男二女，宫位显赫，家庭美满，非常得意。不料檀萝国忽然入侵，他领兵迎敌，打了败仗。他的夫人（即公主）又不幸去世。国王从此不再信任他，不但免去了他的官职，还把他软禁了一个时期，最后把他送回老家。淳于棼一惊，醒了过来，原来是一场大梦。这就是著名的“南柯一梦”。谁若以此为真，那就太可笑了。淳于棼该是啥样还是啥样，朋友还在床边洗脚，窗外偏西的太阳还在睡前差

不多的位置照耀着，睡前喝剩的酒也在原地搁着。跑到大槐树下，挖开树洞一看，里面有个蚂蚁窝，一群蚂蚁聚居在这里。其中有泥土堆成的小城楼和宫殿台阁等等，并有两个较大的蚂蚁住在里面，由几十个蚂蚁保卫着。大概这就是“槐安国”的国都和王宫吧。旁边有一条孔道，往上直通向南的一枝，大概那就是所谓“南柯郡”。淳于棼梦中所见的槐安大国原来就是这样！

那些把人看作抽象的人的人，我们不要相信他们，因为他们无疑也做了场“南柯梦”。

再次，人是从事物质生产等项活动的人。

现实的人一个重要特征，是从事物质生产等项活动。人的活动和动物活动相区别的标志在于，前者是掌握着科学技术、具有一定文化素质的人，在意识、思想、观念支配下自觉进行的活动，后者则是盲目的、本能的。但不能由此认定，人是精神实体。掌握科学技术、具有一定文化素质的人，首先是有血有肉、有物质需求和物质力量的人。思想本身不能改变任何东西，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要改造对象，哪怕使之发生一丁点儿变化，也要靠物质力量。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建立新朝。由于行施着比西汉更残暴的政治，引起全国性的大起义。王莽忧心忡忡，不知如何是好。有人提议：“古时，国家有大灾大难，就采用哭的办法，请求上天援救。”于是，王莽率群臣至南郊，仰天大哭，直至气尽乃不罢休。靠哭救命，结果可想而知。新朝顷刻土崩瓦解，王莽也被起义军杀死在王宫。

《国际歌》中有句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就是靠我们拥有的物质力量，靠我们运用物质力量去革命、去劳动、去创造。在这个过程中，现实的人一方面改造了客观世界，使生产力不断提高，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另一方面，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了自己本身。使自己认识更深刻，品德更高尚，能力更强大，发展更全面。人类就是这样不断前进的。

社会是人类结成的共同体，是保证人们改造世界的有机关系体系。没有人與人相互间的关系，就没有社会。说人是社会的人，就是说他无时无刻不处在社会关系之中。说人是现实的人，就是说他和他人的关系，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条件下，一种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关系。说人是从事物质生产等项活动的人，包含着如下意思：人们创造了这些关系，在它的范围内和支配下从事自己的活动，同时又能改变这些关系，在新的社会关系中继续从事自己的活动。所以，社会的人，现实的人，从事物质生产等项活动的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15. 安泰和他的母亲

安泰，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海神和地神的儿子。他力大无比，在和敌人搏斗中，只要往生身母亲——大地——身上一靠，就会获得新的力量，谁也战胜不了他。但是安泰的致命弱点也在这里，他最害怕别人使他离开地面。后来，一个叫赫拉克勒斯的敌手，利用他的这个弱点，让他和地面脱离，在空中扼死了他。

历史中作为英雄人物的个人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就如同安泰和他母亲的关系。任何英雄豪杰，都是从人民群众中产生的，他的力量来自人民群众，

离开了人民群众，他就一事无成，就会失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一条重要原理。

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英雄创造历史，一种是人民创造历史。

少数英雄人物主宰人类历史，这种观点长期占统治地位。十月革命以前，俄国有个叫民粹派的团体，他们反对沙皇，同情人民，但他们根本看不起人民群众。在他们眼里，英雄人物好比是由阿拉伯数字1和许多0组成的大数目字（如1000000）中的1，而人民群众则好比是那些0。如果没有前面的1，后面0再多，也是没有意义的。唐代韩愈在《原道》中也认为，体现天道的圣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在他的《英雄与英雄崇拜》书中宣布说：“世界史，人类在世界上取得成就的历史，归根到底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有过作为的伟人的历史。”按照这些观点，历史只是由少数“天才”创造的，人民群众没有任何创造性，只能消极盲目地听从英雄人物摆布。这些观点是完全错误的观点。

和英雄史观相反，群众史观主张历史是由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毛泽东同志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里说的“人民”，通常指在历史上未留下姓名、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未打下明显的个人印记，对社会历史起推动作用的人们。“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范畴的内容也不断发展。例如，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由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农民和无产阶级组成的第三等级，属于人民群众的范畴；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就不再属于人民群众的范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主张抗日的阶级、政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其中包括国民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则成了人民的敌人。尽管“人民”这个范畴的内容是变化的，但其基本组成是不变的，任何时候，劳动人民都是人民群众中的主体和稳定的部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命题的含义，是在参与历史活动的一切人中，人民群众对于历史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

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粟、米、布、帛等生活资料，镰刀、斧头、拖拉机、播种机等生产资料，皆出自他们之手。物质财富是社会的根本。古人讲，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位之首。水旱为灾，则五谷不登；五谷不登，则民多穷困；民穷困则易动（为生存而斗争）；易动者，土崩之势也。所以，汉代著名政治家晁错劝汉文帝，“贵五谷而贱金玉”，“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积蓄，以实仓廩，备水旱”。纵观古今中外历史，凡生产不好，物质财富匮乏，天下就会大乱，凡生产好，物质财富丰富，人民就会安居乐业。

人民群众是智慧的源泉。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如《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是在民间口头创作基础上整理加工而成的。许多美妙动听的音乐歌曲，如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四季歌》，都是在民间曲牌词调基础上提炼升华出来的。中国古代发明的指南针，与宋代生产的发展和进行海外贸易航行的需要分不开。瓦特发明蒸汽机，是因为刚刚兴起的资本主义大生产迫切需要动力。自然科学如果离开了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这个源泉，将一事无成。不仅如此，人民群众还是许多精神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我国古代著名发明家鲁班，是一位技巧高超的木匠。位列中国四大发明之一，被视为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一个伟大贡献的活字印刷术，发明者是北宋工匠毕升。纺织革新家黄道婆，是个平凡的劳动妇女。发明安眠

药的，既不是医生，也不是有名的药类专家，而是一个司药。发现盘尼西林的，是一个染坊的洗衣工。发明了电，后来成了传记作家、政治家、科学家的富兰克林，起初只是个卖报的孩子……

以往，计谋常被看作英雄人物的“专利”，其实，它更多地出自人民。汉代淮南王刘安，在他撰写的《淮南子》书中说：“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意思是，把所有的力量集中起来去做一件事情，没有不胜利的；把众人的智慧集中起来去从事一项活动，没有不成功的。这话讲得很对，是对群众力量和群众智慧的赞颂。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一些生产队先后实行了“包产到组，以产计工”的生产责任制，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改革选择以农村为突破口，从农村起步，意义重大。首先，中国要稳定，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农村的稳定。邓小平同志说：“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其次，农村改革先走一步，也能为城市改革提供经验。城市改革中所实行的各种承包制，就是在农村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启示下搞起来的。再次，农村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也给城市改革的成功带来希望，增强了改革的信心和决心。1980年底，全国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14.9%；1984年，实行大包干的队数占总队数的99.1%。也就是这一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创纪录的8000亿斤，人均占有粮食800斤，第一次赶上世界平均水平。这意味着10亿中国人民追求吃饱的年代初告结束，讲究吃好的新的历史阶段已经来到。而这个意义重大、并使几十年来人们梦寐以求的目标得以实现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发明权是农民的。

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从秦末到近代，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大小数百次，波澜壮阔，连绵不断，其规模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仅见的。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西汉的赤眉、绿林起义；隋末的瓦岗军起义；元末的红巾军起义；明末的李自成起义和清朝后期的“太平天国”起义。这些起义或者迫使统治者不得不改变某些残酷剥削压榨农民的政治经济政策，或者直接导致了当时的封建王朝的灭亡。历史上，当旧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旧的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而引起社会矛盾特别是社会基本矛盾尖锐化时，就会爆发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没有军民鱼水、血肉相连的情谊，就没有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没有人民群众的觉醒，没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直接参与，就没有“四人帮”的覆灭，就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也就没有改革的今天。

因为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作用巨大，许多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把他们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战国时，有一次齐国派遣使者拜见赵国的赵太后。太后问使者：“收成挺好吧？百姓挺好吧？齐王也挺好吧？”使者听了很不高兴，说：“臣奉命出使赵国，拜见太后，太后不先问齐王好不好，却先问收成和百姓好不好，岂不是把贫贱者摆在前面，把尊贵者摆在后面了吗？”太后回答：“不对。没有收成，何以有民，没有百姓人民，哪儿来的国君？我所以这样问候，是不能舍本逐末啊！”著名哲学家荀子对民本思想作过形象地说明，他把君比作舟，把人民群众比作水，强调指出，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鲁迅先生则这样评价拿破仑：“有一次拿破仑过阿尔卑斯山，说：

‘我比阿尔卑斯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士兵。”这些思想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值得人们永远牢记。

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并不否认英雄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相反，群众史观充分肯定这种作用。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都是人民群众的有组织的行动。而要把群众组织起来，需要有具有杰出才能的领袖人物提出政治纲领和战斗口号，统一群众的意志，并组织群众实施。优秀的革命家，好像一面战旗，是革命的引导者；他们的思想又好像一把火炬，照亮人们前进的道路。几千年来，那些杰出的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的每个重要关头，都深深地留下了自己的印迹，他们所从事的轰轰烈烈的事业，为社会历史书写了光辉的篇章，历史也将因此永远铭记他们不朽的功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就是这样的杰出人物，毛泽东同志也是这样的杰出人物。邓小平同志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我们的革命很可能至今还没有胜利。在我国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代表的领袖集团，是我国革命取得成功的一个基本条件。

然而，无论英雄人物多么伟大，也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更不能同人民群众对立。英雄人物是在群众运动的时代中涌现出来的，一定要有一个支持他拥护他的群众基础。他之所以是英雄人物，所以能有所作为，是因为他的行动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代表了当时人民群众的愿望。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就是“合乎世界之潮流，应乎人群之需要”。英雄人物代表的群众越广泛，取得群众的支持越大，他在历史上的作用就越大。反之，违背历史潮流，脱离群众，蔑视群众，把群众看作只知“恭喜发财”、“招财进宝”、“妻子儿女”、“油盐酱醋”的芸芸众生，他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就小，很难成就什么事业。唐太宗和楚霸王是两个好例。

唐太宗李世民，号称“马上皇帝”。他18岁带兵，身经百战，善于勤学苦练，成了一个射箭好手，相传他骑马飞奔，一弓在手，常令敌人胆战心惊，怯而止步。唐太宗收藏了不少好弓。有一天，他得意地拿出所有的宝弓，请做弓的师傅欣赏和评论，心想一定会得到他们的赞赏和青睐。不料弓匠们看了又看，全都摇头。唐太宗感到奇怪，问他们为什么摇头。弓匠们斗胆答道：“皇上容禀，这些宝弓中没有一把真正的好弓。”太宗大惊：“怎么，我以弓马打天下，见过和用过的弓不知其数，难道我还不识弓？”弓匠们只好拿起一把把弓谦恭地解释说：“皇上确实力气大，选来的弓都是本质好，硬梆梆，能射得很远；但皇上不懂木头的脉理，选的弓都木心不正，用木心不正的弓射出的箭又怎能百发百中呢？”太宗听罢，恍然大悟，口服心服。第二天一上朝，他对大臣们讲：“我以为自己很懂弓箭，其实并不真懂，弓匠们比我精通。由此联想到，我手下有臣子千千万，百姓万万千，天下大事都靠我一人来独断独行还能不出差错？你们可得尽心尽意帮助我理政啊。”于是，唐太宗作出决定、在京大臣要到皇宫轮流值夜，好及时同他们商议国事，听取批评建议。他广开言路，举贤纳谏。魏征曾辅佐过李世民的哥哥同时也是死敌的李建成，但唐太宗不计前仇，让他当了宰相一级的“侍中”，并把魏征的话“廉听则明，偏信则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魏征死后，唐太宗十分悲痛，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由于善于用人，善于汲取臣民的智慧，唐太宗成功地实现了“贞观之治”，开创了盛唐基业，他本人也成为我国古代封建帝王中少有的杰出人物。

楚霸王项羽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形。他身高八尺有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勇猛无比。在推翻秦王朝的大起义中，他所率领的军队百战百胜，所向披靡，杀得秦军魂飞胆破。一时间，项羽的名声威震八方。司马迁《史记》记载：“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可是在与刘邦争夺天下时，项羽却在垓下大败，最后自刎于乌江边。临死前，他对身边仅剩的 28 名骑兵说：“我起兵八年，身经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从未失败过，因此霸有天下。但是现在竟被围困在这里，此乃天要亡我，不是仗打得不好啊！”接着又说：“今日固然要死……但我要向诸君证明，确实是天亡我，不是仗打得不好。”怎样证明呢？项羽约定做三件事：（1）击溃敌人围困；（2）斩敌一将；（3）砍倒敌人军旗。说完便冲入敌人阵中，斩汉将两员，杀数十百人，汉军旗倒人溃。事毕，项羽问部下：“我说的如何？”手下皆心悦诚服：“大王所言极是。”从以上历史记载来看，项羽临死，连说是“天之亡我”，可见他把失败的原因归之于天命，而认为自己是没有什么过失的。汉代著名学者杨雄不同意项羽的观点，他在《法言·重黎》中评论刘、项兴亡时说：楚汉相争，所以汉胜楚亡，是因为汉王刘邦尽量发挥了利用众人的智谋与力量，而项羽却只凭一己的“匹夫之勇”，没有充分调动部下的积极性和采纳他们的建议，这才是项羽失败的主要原因。杨雄的看法是对的。刘邦自己说过：“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肖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反观项羽，韩信、陈平、黥布原先都是他的部下，因为才能得不到施展，转而投靠了刘邦；只剩下一个范增，以“好奇计”著称，是刘邦的心腹之患，最后也让他赶跑了。如此众叛亲离，孤家寡人，焉有不败之理！垓下之战，本来项羽已突出重围，但到阴陵时迷了路，问一种田老人怎么走，老人说：“向左。”项羽率军急向左去，不料陷入大泽之中，原来老人骗了他。等折回头来，汉军已经追了上来。如此不得民心，焉能不亡！

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今天，中国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力量。他们豪迈地宣告：“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改革开放中，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无数艰难险阻，但只要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就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没有实现不了的目标！

16. 燃起生命之火

80 年代以来，人的价值成为热门话题。一方面，理论的探讨步步深入，另一方面，对现实生活的价值反思也进行得轰轰烈烈。许多人，尤其青少年，常把“自我价值”、“自我奋斗”、“自我实现”挂在嘴边，可谓言必称价值。

什么是人的价值？邹韬奋先生说：“一个人光溜溜的到这个世界来，最后光溜溜的离开这个世界而去，彻底想起来，名利都是身外物，只有尽一人的心力，使社会上的人多得他工作的裨益，是人生最愉快的事情。”（《韬奋文集》第 1 卷，第 13—14 页）歌德说：“要是游戏人生，他就一事无成；谁不能主宰自己，永远是一个奴隶。”（引自《人生就是奋斗》，第 5 页）

韬奋先生的意思是，人的价值在于他为社会为他人贡献了些什么。歌德诗人的意思是，人应当“自强不息”、“自健其行”、“自主以恒”、“独立不惧”。他们俩人从不同方面揭示了人的价值。价值是反映主客体关系的范畴。在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中，客体是否按照主体的尺度满足主体需要，是否对主体的发展具有肯定作用，这种关系的表现就是价值。主体指人，客体指人认识改造的对象。人的价值就是现实的人同满足其需要的客体间积极肯定的关系。但是，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道德品质，人和人相互间的关系，人们结成的社会共同体（阶层、阶级、社会），一句话，人本身也是认识和改造的对象，因此，人既是主体，也是客体。作为主体，人的价值是其需要得到社会、他人的满足；作为客体，人的价值是使社会、他人的需要得到满足。贡献社会和自主命运，是人的价值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

对待人的价值，有种种不同的乃至截然对立的观点。

我国战国时代的杨朱认为，十年也是死，百年也是死；圣贤也是死，凶愚也是死，死后都是一堆腐烂的骨头，无所谓好坏贤愚。因而他主张人生应纵欲享受，“墙屋台榭园囿池沼，饮食车服，声乐嫔御”，“究其所欲，以俟于死”，除此之外，人生别无欢乐。这是享乐主义价值观。享乐主义价值观把人生价值归结为吃喝玩乐，否则就是白活一世，其信条是“及时行乐”。为了“尽一生之欢”，穷当年之乐，即使毁坏名誉，也在所不惜。在封建剥削阶级看来，“官之位高矣，官之位贵矣，官之权大矣，官之威重矣”，只要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就可以高高在上，享不尽荣华富贵。一人当权，鸡犬升天，人生的目的就是不择手段，不惜一切，追求权力。这是权力意志主义价值观。权力意志主义价值观具有强烈的攻击性，其特点“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它严重破坏人们之间平等和谐的关系，毒化社会环境，危害社会机体健康。资产阶级和一切没落阶级奉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观点，认为“人人都是自私的”，“人对人是狼”。追求个人利益是人生的出发点和归宿，一个人愈能够寻求自己的利益愈是有德性，忽略自己的利益便是软弱无能。拔一毛而利天下之事，因为损害个人利益，决不为之；反之，别人无论遭受多大痛苦与不幸，只要我得到好处，就可以不顾一切去做。这是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在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极为流行，是一切剥削阶级共同遵循的价值原则。享乐不是别人享乐，是我自己享乐；权力不是别人的权力，是我个人的权力；享乐主义价值观和权力意志主义价值观都可以在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那里找到渊源，是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不同表现形式。产生上述错误观点的原因很多，从理论上讲，主要是割裂了人的价值的两个方面，片面地强调了一个方面，忽视了另一个方面。即只看到人是主体，应该得到满足，没看到也根本不想看到人同时是客体，应当满足他人；并且把作为主体的人仅仅归结为个人。这样，原本内容极为丰富的人生价值，被肢解的血肉模糊，残不忍睹，只剩下“我”——一个扭曲的、畸型的、丑恶的“我”！

无产阶级在继承人类一切优秀品质的基础上，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它的最高原则是解放自己，解放每一个人，尊重他的权利，满足他的需要，促进他的身心全面发展，而为了解放自己，首先要解放全人类。因此，可以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话看作无产阶级价值观的体现：“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致于因为虚度年华而痛悔，也不致于因为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

‘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无产阶级价值观把满足自身同贡献社会紧密结合起来，是唯一正确的价值观。

不同的人生价值观，导致不同的结果。有个故事，说一个人见到别人有许多黄金，就直接去抢，被当场抓住，问他为什么这样明目张胆抢别人东西，他说：“光看见黄金了，没看见人。”说明满脑子拜金意识，会导致罪恶行径。与之相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居里夫人，把英国皇家学会颁发的奖章给女儿当玩具玩，别人大惑不解，居里夫人却说：“我是想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荣誉就像玩具，只能玩玩而已，否则就将一事无成。”说明将功名置之度外，只醉心于造福人类的事业，可以使人升华到一种高尚的境界。

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要有高尚远大的目标。中国古代杰出政治家诸葛亮，曾热情倡导人们要“立大志”、“修人品”，强调“志当存高远”，告诫人们要力诫“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性，永窞伏于凡庸”。明清之际的贤哲黄宗羲说，要成为豪杰，首先要立志，并把志向贯彻于言行之中，有了远大的志向，才有高尚的品行。贺龙同志是北伐战争中功勋卓著的英雄。当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急剧恶化时，他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武汉国民政府委任他的二十军军长——高官厚禄；一是跟共产党走——出生入死。贺龙同志毅然选择后一条道路，参加了南昌起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说：“我要的不是个人前程，我要的是国家民族和劳苦大众的前程。”革命先烈夏明翰，出生在有钱有势的封建绅士家庭，他的祖父希望他继承家业，光宗耀祖。但是，他却选择了充满艰辛的革命道路。被捕时，敌人从他身上只搜到一支手电筒、一块怀表和一副眼镜，牺牲时年仅 28 岁。他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而献身的崇高精神。

实现人的价值，要靠艰苦努力。人的价值作为主客体间的一种关系，是在实践中产生的，也要在实践中实现。实践过程不是舒舒服服的过程，有许多困难矛盾，有许多急流险滩，成功与汗水相交织，胜利与代价相辉映。只有在崎岖的人生旅途上不畏艰险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世界著名音乐大师贝多芬，小时候喜爱音乐。但因家庭经济拮据，中学毕业就失学了。正当他力克艰难靠自学在音乐艺术上初露才华的时候，失聪的恶魔又向他袭来。一个音乐家失去听觉，就像一个画家失去眼睛，一个歌唱家失去喉咙，该是多么痛苦！无情的生活折磨，使贝多芬经历了一场险恶的生命危机。他曾决定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一生，然而在生死选择的紧要关头，对生活的热爱使他成功地战胜了自我。他从绝望中奋起，以顽强的毅力，非凡的才能，写出了一篇篇激情满怀，气势磅礴的杰出乐章，成为世界古典音乐大师。大医药学家李时珍，从事医药搜集研究工作 30 多年，走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吃尽了千辛万苦，才写成了医药学巨著《本草纲目》。大史学家司马迁，被汉武帝处以官刑，毁身败誉，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但他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以超常的努力，在狱中完成了被称为我国第一部“通古今之变”的史学巨著《史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不可能每个人都有贝多芬、司马迁那样坎坷的遭遇，然而任何一个人，要实现自己的价值，都要付出艰苦努力，这一点是共同的。因而，贝多芬、李时珍、司马迁等人的精神也是必须学习的。在这个意义上，贪图享乐的人、害怕吃苦的人、不愿付出劳动代价的人，不可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实现人的价值，不能贪图物质享受。这是因为，一方面，从内容上看，人的价值既包括物质性内容，也包括精神性内容，片面强调物质享受，容易忽视精神生活及其需要的满足，而一个人如果精神生活不健全，物质生活再好也不是健全的人。另一方面，玩物丧志，沉湎于物质享受，容易失去理想，滋生骄气，养成惰性，在纵情声乐之中成为贪图享乐、害怕艰苦，不愿付出劳动代价的人，即一个不能实现自己价值的人。需要指出，不贪图物质享受，不是不要物质享受；讲求精神满足，不是提倡禁欲主义。我们的工作，就是要使大家生活得更美好，不仅精神生活更美好，而且物质生活更美好。所以，只要条件允许，人们有理由满足自己更高的物质欲求。但是不要“纵”，不要“贪”，不要“过”，不要把物质享受当作“唯一实惠”的东西。因为，物极必反，那样一来，就会为了物质享受钻进钱眼儿里，就会扭曲自己的人格，甚至为了几个钱，会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重视人生价值的民族，是一个具有优良传统的民族。《论语》中记载了一段孔子和他的学生谈论志向的对话。孔子说：“你们为何不谈谈自己的志向呢？”子路说：“我的志向是愿把我的车马衣裘与朋友们共同享用，即使用坏了也没有什么遗憾和不满。”颜渊说：“我的志向是不夸耀自己的好处，不彰显自己的功劳。”子路随即问孔子道：“希望听听您老先生的志向。”孔子说：“我要使老年人享受安乐，让朋友们信任我，让年轻人怀念我。”由此可见，孔子是把处理好自己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作为自己的价值目标的。孔子的另一位学生子贡问他：“假如有这样一个人，广泛地给人民以好处，又能帮助大家生活过得好，可以说是行仁道了吧？”孔子回答：“何止是仁道，简直是圣德了！”子路问：“怎样才算是一个君子？”孔子告诉他：“修养自己并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子路说：“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使一些人得到安乐。”子路又说：“这样就够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使老百姓都得到安乐。”这就清楚地表明，在孔子那里，一个人应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孔子是提倡兼善天下和重视群体的价值思想的。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价值观。强调乐民之所乐，忧民之所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还说，舍己以从人，“达则兼善天下。”在要求把个体置于群体之中的同时，孟子也十分重视个体价值，提出了大丈夫的理想人格：“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

先秦墨家认为，理想的人格是“爱人”、“利人”的“兼士”。要做到爱人、利人，就必须从言论到行动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宗旨，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庄子·天下篇》对此描述得很详细：“墨子称述，‘从前大禹堵塞洪水，疏导江河，从而沟通四夷九州，大川三百，支流三千，小溪无数。大禹亲自拿着盛土器和锄头汇合天下的河川，以致劳累得腿肚子上没有肉，磨损得小腿上无有毛，骤雨淋身，强风梳发，设置了万国。禹是大圣人，而为了天下，却这般的含辛茹苦。’所以使后代的墨者，身穿粗布衣服，脚踏木履草鞋，日夜不息，以自苦为乐，并说不这样，就不是行禹之道，也不配称为墨者。”

这些思想体现了中国人民吃苦耐劳、躬行实践的高贵品质，和以江山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理想和正义事业勇于献身

的精神。几千年来，这种精神鼓舞无数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为祖国的繁荣富强，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今天，每一个人都应继承这种精神。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燃起生命之火，在献身社会、实现群体价值的同时，让自己的一生划出一条闪光的轨迹。

六、社会评价之谜

生活在社会中，一件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事，是对历史的现实的人或事作出正确评价。生活在社会中，一件非常困难、非常容易犯错误的事，是对历史的现实的人或事作出正确评价。有些事看起来很简单，深究下去极为复杂；有些事表面一目了然，实则截然相反；过去被视为正确的观点行为，用现在的标准看未必正确；过去被视为错误的观点行为，用现在的标准看却可能正确。

这是不是意味着评价历史的现实的人或事可以随心所欲，没有客观标准？不是！真理是客观的，实践标准是确定的。只是要把握它们，需要有正确态度，正确方法。

17. 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准

宏观考察一个社会，根据什么说它是进步的，根据什么说它是落后的？

汉高祖刘邦，晚年宠幸戚夫人，欲立其子赵王如意为太子，在大臣们的反对下未果。吕后因此和戚夫人结怨。刘邦死后，吕后专权，欲杀赵王如意及其母戚夫人。汉惠帝闻之，忙将赵王接到自己宫里，与之同吃同住，吕后几次想杀赵王，都没有机会下手。一日，汉惠帝早晨外出射猎，赵王因年少，未能起床同行。吕后趁机派人将赵王毒死，然后令人砍断戚夫人的四肢，剜去眼睛，熏聋耳朵，饮以哑药，扔进厕所，呼为“人彘”。几天后，召汉惠帝一同观看人彘。当惠帝得知这就是戚夫人时，大哭不止，因此得病，一年多卧床不起。使人对吕后说：“这样对待赵王和戚夫人，非人所为，我作为太后您的儿子，无法治理天下。”从此，汉惠帝终日饮酒作乐，不听朝政。

对这件事，《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评价说：“当儿子的，父母有不对的地方应劝阻，劝阻不听，则嚎陶大哭一场，然后顺从父母。哪有守高祖之业，位天下之主的人，因不忍母亲的残酷行为，就置国家于不顾，纵酒色以伤生的！汉惠帝是笃小仁而不知大义啊！”司马光关于父母有过，劝而不听，只能嚎陶大哭的观点值得商榷，但他关于不能因此把国家大事扔在一边不管的说法，有道理。按照汉惠帝的观点，母亲吕后做了极残酷不仁的事情，做儿子的就无颜去说别人管国家了。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汉惠帝头脑中有一条信念：伦理道德是治国之本，是衡量君臣言行的根本标准，当然也是衡量社会好坏的根本标准。表面看来，汉惠帝的信念无可非议，其实不然。对一国之君来说，伦理道德固然是他治理国家时不可忽视的事务，但绝不是唯一的事务，也不是具有根本意义的事务。根本的是什么呢？司马光没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为经济基础（社会经济制度）和上层建筑（国家政权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因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原始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尊卑贵贱，氏族部落内部人与人的关系平等，大家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同甘苦，共患难，相亲相依。奴隶社会把这一切撕得粉碎，多数财富极不公平地被少数奴隶主占有，多数劳动人民上无片瓦，下无插锥之地，被迫沦为奴隶。奴隶主全不把奴隶当人待，逼使

他们牛马一样劳作，猪狗一样生存，从肉体到精神夺去了他们所有的自由。应该说奴隶社会是极不道德的，但在历史长河中，奴隶社会却是一种比原始社会进步的社会形态。原因就在于，奴隶社会提高了生产力，并由此带动了文化、艺术、科学等等的发展。封建社会，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压迫，与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压迫没有质的不同，但人们却赞扬封建制，贬低奴隶制，歌颂推动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革新派，抨击阻挠过渡、维护没落奴隶制的保守派。原因也在于，封建社会有比奴隶社会更先进的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无情地鞭笞了资产阶级，指出：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一切田园诗般的关系都被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的情感，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一项受人尊崇令人敬畏的职业，被资产阶级抹去了耀眼的光环，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都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非常革命的阶级。因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只是现在，资产阶级像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使生产力的发展受到极大阻碍，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显得越来越狭窄，越来越不能容纳日益庞大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的丧钟才敲响了。而社会主义所以能够战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制度所以有巨大的优越性，就是因为它能使在资本主义社会受到阻碍的生产力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能创造比资本主义更强大的生产力。

历史证明，道德从来不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尺度，无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还是从原始公社向资本主义的依次更迭，起决定作用的都是生产力。生产力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与否的根本标准。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根本标准。

把握生产力标准要注意：作为根本标准的生产力，不是唯一标准，也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社会生活是极其复杂的、多方面的，衡量它们的标准也是具体的、多层次的。看不到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多样性及其判别尺度的具体性、层次性，把生产力标准当作衡量一切的标准，当作唯一标准，就会犯简单化、绝对化的错误，恩格斯曾批评这些人说：“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我国现在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低，是这个阶段的基本国情。看不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留下的烂摊子，抓住现在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低，就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是错误的。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尽快把生产力搞上去，同样是错误的。“左”的路线，空喊革命口号，大搞“阶级斗争”，在新技术革命兴起，生产力飞速发展的年代，白白让我们浪费了20多年的宝贵时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

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荒谬逻辑，扼杀了社会主义的繁荣，削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批判“左”，防止重蹈以往覆辙，就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当前稍纵即逝的机遇，把生产力搞上去。在我们这样的大国把生产力搞上去，就能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我们这样的大国把生产力搞上去，就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们这样的大国把生产力搞上去，中华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每一个人就有了前途，有了希望。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对待生产力的态度，像一面明镜高悬，映显出每个人、每个政党对社会主义的真诚与虚假。

18. 历史主义态度

以什么态度对待所评价的事物，至关重要。态度不同，结果大不一样。

楚汉相争，汉军常打败仗。刘邦与谋士酈食其商量对付楚军的办法。酈食其说：“古时汤伐桀，封其后于杞；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今天，秦朝失德弃义，侵伐诸侯，把他们的国家都灭亡了，使他们无处安身，陛下如能复立齐、楚、燕、赵、魏、韩六国国君的后人，他们君臣百姓必然感戴陛下的功德，甘当陛下的臣民。功德道义施行了，陛下南乡称霸，楚只能恭恭敬敬前来朝拜。”刘邦大喜，说：“好，我马上让人刻六国印，先生走时带着。”酈食其还没走，张良外出回来，前来拜见刘邦。刘邦正在吃饭，对张良说：“子房到前面来，有人为我谋划好了对付楚军的办法了。”于是把酈食其的计划说了一遍，说完问张良：“这个办法怎么样？”张良听完大惊，问刘邦：“是谁给陛下出的这个主意？若按他说的做，陛下夺取天下的大事就完了！”刘邦很奇怪，问道：“这是从何说起？”张良说：“请让我对照前人，为大王分析。汤、武封桀、纣之后时，能掌握他们的生杀大权，今陛下能制项羽于死地吗？这是不能封后的第一个理由。武王打败殷商后，表彰商朝的贤人商容，释放商朝国师箕子，为纣王的叔父比干扫墓，今陛下能吗？这是不能封后的第二个理由。把仓库里的米、宫廷里的钱散发出去，救济贫穷，今陛下能吗？这是不能封后的第三个理由。伐纣事毕，拆卸盔甲，倒载兵器，向天下人表明不再打仗，今陛下能吗？这是不能封后的第四个理由。将战马在华山南面放掉，以示无为，今陛下能吗？这是不能封后的第五个理由。将牛在桃林北面放掉，表示不再用它们运输粮食，今陛下能吗？这是不能封后的第六个理由。天下的游士背井离乡，舍亲人故旧，跟随陛下征战，为的是得到朝思暮想的咫尺封地；现在复立六国之后，天下游士就会各事主，与家人团聚，与故旧重逢，守祖先宗庙，陛下靠谁夺取天下？这是不能封后的第七个理由。况且楚军那么强大，难说复立的六国之后不会服从于楚，谁还会向陛下称臣呢？这是不能封后的第八个理由。所以，如果用了那个人的计划，陛下的大事就完了。”刘邦听着，饭也不吃了，将嘴里的东西吐出来，骂道：“竖儒差点坏了我的大事！”立即令人取消了刻印。

在对待是否封后这个问题上，酈食其和张良表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酈食其机械地照搬前人的做法，以为古代圣王汤、武都封后，汉王刘邦也应封后。张良则分析了古今环境和条件的不同，主张从今天的实际情况出发，不照搬古人的做法。用哲学的话说，酈食其的态度，是教条主义态度；张良的态度，是历史主义态度。历史主义态度就是：（1）尊重历史实际，把历史人

物、历史事件看作历史条件、历史环境的产物，并从这个条件和环境出发加以分析和评价。(2) 注意历史演变，着眼于事物的发展和变化，从该事物的演变过程中，把握其来龙去脉，预见其未来趋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历史主义态度的核心。它要求分析者不教条、不僵化、不想入非非、不因循守旧，不用今天标准苛刻古人，也不用过去的观点束缚现在，一切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做到这一点，就能得出正确结论，引导行动达到成功；做不到这一点，就得出不出正确结论，引导行动于失败。项羽实际上已经采用了酈食其推荐给刘邦的那套办法。鸿门宴后，他赶跑了刘邦，轻易大封诸侯王。受封的六国遗老遗少忙于维持自己的地位，结果，在项羽遇到困难时，谁也无心助战。而刘邦采纳了张良的计策，不轻易封诸侯王，使手下人怀抱受封的希望，出力助攻项羽，即使多次受挫，也不动摇，最后，刘邦、韩信、彭越等各路军马会师垓下，一举消灭了项羽，夺取了天下。

明代刘元卿在《应谐录》中讲的一个故事同样发人深思。“于嗔子与友连床，围炉而坐。其友伏案读书，衣裳碰着炉中之火，很快燃起来。于嗔子从容立起，走到朋友前恭恭敬敬站好，先行一礼，然后说：‘适有一事，想告诉你，知你性情急躁，怕你听了生气；不告诉你，则是对人不忠。只有你允许，听了不发火，我才敢说。’朋友回答：‘君有何要说，我一定小心领教。’于嗔子谦让了一番，又谦让一番，才告诉朋友：火烧着你的衣裳了。朋友急忙起身，衣服已烧得不成样子。朋友火了：‘为什么不赶快告诉我？都什么时候了，还这样不慌不忙！’于嗔子一脸委屈，嘟嘟囔囔地说：‘人们都说你性急，今日看来果然如此。’”对脾气暴躁的人，是不应该火上浇油，但水火不饶人，救火如救命，都火烧衣裳了，却碰上于嗔子这种不紧不慢的迂腐儒生，还埋怨人家“果然性急”，岂不让人哭笑不得！

诸如此类的事例可以举出许多。如果有些仅是让人感到既好气又好笑，有些则不那么轻松了，它们包含着血的教训。

历史主义态度可以使避免上述恶果。但在评价历史和现实中的人和事时真正树立历史主义态度并不容易。直到今天，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左”的思想等非历史主义倾向，还在相当一批人头脑中存在。有些文学作品电影电视，在描写古代英雄人物时，就好像在写现代的大政治家，甚至于干脆写成了一个革命领袖的样子，说的话也和现代政治术语差不多。还有一些小说写农民起义，就像写八路军，无论描写他们的纪律和联系群众的作风，还是描写他们作战的勇敢和浩然正气，都或多或少地套上了八路军或人民解放军的形象。这些作品的作者犯了用今天的眼光想象评价古人古事的错误，仿佛不这样就不够味，思想境界就不高。有些人则在新的形势下，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墨守陈规。或者停留在过去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完全扭曲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改革开放前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和政策上，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因而总觉得现在的改革开放这也不对那也不好。还有一些人，在评价同一个人、同一件事时，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全盘否定，说他好，从来就好，好的一点缺点没有，说他坏，从来就坏，坏的一点优点没有。这些非历史主义态度已经使我们的革命和建设蒙受了巨大损失，要防止它们今后继续给我们造成危害，尚有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

树立历史主义态度，最重要的是坚持实事求是。《战国策·齐一》中讲：

“邹忌是一个长得魁伟漂亮的男子。一天早上，他穿好衣服，对着镜子，问他的妻子说。“你看我比住在城北的徐公哪个漂亮？”妻子答道：“你很漂亮，徐公哪能比得上你呢？”徐公是闻名齐国的美男子，邹忌不相信自己会比徐公更漂亮，于是又去问他的妾：“你看我和徐公比，哪个漂亮些？”妾也这样回答：“徐公么，他哪能比得上你呢？”过了一天，有个客人来访谈，邹忌又顺便问了问客人，客人的回答也一样：徐公没有你漂亮。又过一天，徐公来了，邹忌将徐公仔细打量了一番，自觉不如徐公漂亮。徐公去后，他又去照了一照镜子，更觉得自己逊色很多。“为什么明明我不如徐公漂亮，别人却要说我比他强呢？”晚上睡觉，邹忌想了又想，终于得出结论：“妻子偏爱我，当然说我漂亮；妾怕我，所以也说我漂亮；至于客人当面捧我，还不是因为他有求于我吗？”邹忌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能承认徐公比自己漂亮这个事实，并分析出妻、妾、客人不说真话的原因，可谓有自知之明。生活中，这样的事人们常会遇到。无论对他人的表扬、社会的赞誉，还是对别的什么东西，都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采取历史主义态度，把握事物的本质而不为表面现象蒙蔽。

19. 不求全责备

求全责备常常使人对人对事的评价发生扭曲。而求全责备恰恰是对人对事评价中常见的现象。小到一个单位评选先进人物，大到国家推行某项改革政策，人们的评价往往求全责备。仿佛一个人有凡人的欲求、凡人的错误，就不配当先进；一件事产生某些副作用、造成一些矛盾，就有理由口诛笔伐。结果，一个人办了十件事，九件对的，一件错的，不但得不到表扬，还要做检查！久而久之，什么也不做，或者仅“奉命”而做，成了明哲保身的办法。

齐国贵族孟尝君，喜爱广结朋友，门下有食客数千。有一段时间，孟尝君对自己的一个上流门客不喜欢，想把他赶走。鲁仲连知道后连忙对孟尝君说：“猿和弥猴有善于攀援的绝技，但如果离开树木，而让它们进到水里，就比不上鱼鳖游动自由。良马有日行千里的高超本领，但要让它经历险阻、攀登高峰，就比不上狐狸。曹沫用力举起三尺宝剑，全军就不能抵挡，但若让他使用农具像农民一样在田间干活，就不如农民。所以，我们任用人才时，如果舍弃他的长处而使用他的短处，即便唐尧也有做不到的啊！因为他不能胜任，就说他不符合要求；由于教诲人的效果差，就说他笨拙。笨拙就要把他撵走，不符合自己意愿的就抛弃人家。这样，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图谋报复，这难道不是我们应该汲取的主要教训吗？”孟尝君听完，茅塞顿开，欣喜地说：“你说的好啊！”于是决定不再驱逐那位门客了。

这个故事揭示的道理，是“人无完人”。每个人的智力和能力都有限，不可能三百六十五行行成“状元”，所谓“多才多艺”，也是相对而言的，他有自己的长处，也总有自己的短处，有优点，也有缺点，因而要找一个十全十美、不犯错误的人，不可能！伟人也会犯错误。长期以来，人们的传统观念或生物学教科书都认为，凡是哺乳类动物都是胎生的，不是卵生的。可是，1843年，在英国博物馆却意外地展出了从澳洲带来的鸭嘴兽生的蛋。鸭嘴兽是哺乳类动物，因为它的嘴像鸭子，又扁又大，故名鸭嘴兽。这种动物产于澳大利亚东部塔斯马尼亚的山溪、河湖里，既哺乳，又生蛋。雌性鸭嘴兽产卵后，便把卵紧紧抱在胸部，直到孵出小鸭嘴兽为止。初生的鸭嘴兽，

从母亲腹部的乳分泌孔内吸食乳汁而逐渐长大。但当时许多生物学家都不相信这些，说是荒谬的捏造，与书本不符！有人甚至大发雷霆，向博物馆提出抗议，要求撤销这种哗众取宠的所谓展览。这件事惊动了恩格斯，他好奇地参观了展览。当他看到蛋以后，也哈哈大笑，认为鸭嘴兽既然会生蛋，就不可能是哺乳动物。哺乳动物就是胎生哺乳的，怎么会下蛋呢？然而，当他了解到上述真相，完全证实这确是鸭嘴兽生的蛋时。就断然改变了旧看法。后来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歉疚地写道：“我在曼彻斯特看见过鸭嘴兽的蛋，并且傲慢无知地嘲笑过哺乳类动物会生蛋这种愚蠢之见，而现在这却被证实了！因此，但愿您对价值概念不要做我事后不得不请求鸭嘴兽原谅的事情吧！”

人无完人，金也无足赤。任何事物都一分为二，都有自己的二重性。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阳春之曲，和者必寡；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良药苦口，忠言逆耳；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穷则思变；乐极生悲；终日伏案苦读，容易劳损身体；生命在于运动，运动容易受伤；电视机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电影院的日子却从此不再好过。改革是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昌盛的唯一出路，不改革绝无希望；改革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例如，改革使人们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也打破了某些过去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使人们感到不适应并产生一定程度的心理紧张。改革使我们得到了急需的资金、技术，学到了宝贵的经验、知识，开阔了眼界，争取了时间；同时，西方某些腐朽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也乘机通过敞开的国门而鱼目混珠涌入国内，成为吸毒贩毒、嫖娼卖淫等丑恶现象滋生的外部刺激因素。

显然，要求人是完人，金要足赤，理论上说不通，实践中也办不到。假若求全责备，历史上和现实中就不会有一个好人，也不会有一件好事。所以，求全责备是社会评价中一种非常错误的方法。

每个人和事都有自己的缺点或不足，那么怎样确定它们的好坏呢？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著名著作《矛盾论》中告诉我们一个方法：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即看该事物或人优点与缺点长处与短处、功与过哪方面是主要的，以此确定这个人或这件事的归属。古时赵国有个人，家里老鼠成灾。他四处寻找捉老鼠的好猫，最后在中山国要了一只。这只猫善于捕捉老鼠，但也很喜欢捉鸡充饥。一个多月后，赵人家里的老鼠被捉捕了不少，可是鸡也被吃光了。赵人的儿子颇感忧虑，几次请求父亲把这只猫送走。赵人回答说：“这个道理你还不明白吗？我们家的祸患在于老鼠，而不在没有鸡。家中有了老鼠，就会偷吃我们的粮食，咬坏我们的衣服，打穿我们的墙壁，破坏我们的家具，我们就要挨饿受冻。这些损失，不是比没有鸡更厉害吗？没有鸡，只不过不吃鸡而已，谈不到挨饿受冻。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把猫送走呢？”儿子听罢，觉得有道理，最后也同意将猫留下。这个故事说的，就是在评价事物时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抓住了它，就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就能识大体、顾大局，辨别正确方向，选择正确道路，避免因主次不分、性质不明而犯错误。

有的同学或许会说：“找一只猫，光捉老鼠不吃鸡，那不更好吗？”果然如此，当然更好。但有些时候，在有些条件下，人们费尽心机也找不到那样的猫；有些时候，在有些条件下，即使找到了，猫在捉老鼠的时候，也可能弄脏床铺、碰翻油瓶，让你心烦意乱。事实上，人生活在现实而非理想中。现实的条件总是一定的，它给人们提供的活动舞台也是有限的。人们只能在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历史舞台的空间中展开自己的活动，不可能超越这个舞台和条件。因而，人的活动及其结果不论当时看怎样伟大，回过头来看，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局限性。对这一点，古人早有所悟，强调事物不论大小，只要满足了自己的本性，就是完整的、好的。比如，秋毫那么小的东西，只要它的本性得到满足，就不算小，可以算是最大的东西；泰山那么大的东西，如果它的本性得不到满足，就不算大，可以算是最小的东西。马克思把这个道理上升到哲学高度，告诫人们：“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古今中外伟人贤哲讲的这些话，意思都是一个：尽心尽力，做了历史允许做的事，就应给予肯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虽然仅仅吃了一只螃蟹，却是了不起的人。

20. 切忌主观主义

以道德作为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准、非历史主义态度和求全责备都是主观主义。主观主义是唯心主义。主观主义从愿望出发，凭想当然办事，是社会评价的大敌，许多错误、许多迷惑的产生，皆由它起。

首先，主观主义不辨真假，伤害好人。主观主义者评价一个人，不是听其言，观其行，看其果（行动的结果），而是从个人的好恶出发，用某种先验的标准加以裁判。投其所好，合其标准的，就是好人；违其所好，背其标准的，就是坏人。有时甚至到了疑神疑鬼、无中生有的地步，因而常常伤害好人。很久以前，有个农民，不慎失落了一柄斧子。他遍找无着，就以为是隔壁人家的儿子偷的。于是，他处处注意那人的一举一动，觉得那人走路的样子，说话的声音，都和平常人不同。总之，怎么看那人都像个小偷。可是由于找不到证据，虽想揪住那人痛责痛打，也无从下手，只好暗地里四处散布，×××是小偷。弄得那人名声扫地。后来，农民那柄失落的斧子找回来了。原来是他上山砍柴时，自己掉在山谷里的。第二天，又碰见隔壁人家的儿子，再留心看看，那人走路的样子，说话的声音，就都不像一个小偷了。这算不错，斧子找到了，农民只是暗地里疑神疑鬼、说人坏话，邻人也不知道。倘若斧子找不到会怎样？倘若邻人的儿子知道了是谁在诬陷自己是小偷又会怎样？最近发生在南方某省农村里的一件事，可以让我们窥见一斑。还是一个农民，丢失了一头牛，非常恼火。晚上睡觉，梦见是邻居偷的。以此为据，第二天一早，告到治保会，将邻人抓来，严刑逼供，屈打成招。邻人妻子不服，四处上诉，村里、乡里竟无人干预，主持公道，致使邻人几近家破人亡。最后上诉到县人民代表大会，引起重视，派出调查组，才水落石出。冤案是审清了，然而邻人一家遭受的痛苦能弥补吗？这种事情极端荒唐，然而这种荒唐的事情绝非一件两件。多少人间悲剧，无不是主观主义所为。

其次，主观主义一厢情愿，误国误民。主观主义者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尊重客观规律，他们在头脑中构造事物发展的计划，在头脑中构造完成计划的措施，然后又在头脑中想象计划措施执行的如何好，取得的成绩如何大，人们如何高兴，如何热烈支持和拥护。一旦有人提出批评，他们便不高兴，

给人扣上种种大帽子，极力压制和排斥。此种作为，很像《道山清话》中的一个人。这个人长得很丑，叫画家给他画像，第一张画了，他嫌不好，叫画家重画一张，第二张画了，仍嫌不好，画家给改画了三四次，他还是不满意，说画家把他画丑了。画家最后也火了，说：“我已经尽量给你美化了，你还不领情，假如画得同你的尊容一样，那才丑死人呢！”我们不要学这个画家，他为了讨好对方，就不顾客观实际，尽量地给予美化。这不是帮人，而是误人。真正的朋友，真正的革命者要有敢于坚持真理的大无畏气概，美就是美，丑就是丑，既不要违背事实去美化，也不要违背事实去丑化。即使砍头枪毙，也不能弄虚作假，歪曲事实。我们更不要学那个丑人，当他看到自己的肖像不美时，不是对着镜子端详一下自己的长相，却责怪画家，非要人家说自己好才行，真是自欺欺人。自欺欺人者，自食恶果。有些地方和单位本来十分贫穷，经济落后，却劳民伤财，把有限的资金和物力用来大搞形式主义，不但没有脱贫，反而更加穷困。有些企业为当先进、为晋级或为别的什么东西，虚报产量、产值、利税，不但没使企业好起来，反而弄得亏损累累。有些部门、有些领导头脑一热，就上一个项目，千百万元资金投进去，建成的工厂或者无原料，或者无能源，或者无市场，不但没有创造新价值，反而造成极大的浪费。说它误国误民一点也不过分。

最后，主观主义沉溺于幻想，自寻烦恼。主观主义者不辨真假，伤害好人，一厢情愿，误国误民，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由于从主观愿望出发，他们凡事都往好处想，人应当是“高大全”的、对我好的、听我话的、赞美我的、支持拥护我的，事应当是完美无缺的、巨大成功的、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光辉灿烂的、惊天动地的、一帆风顺的、前途无限的。一旦遇到挫折，遇到失败，发现现实并不像自己原来想的那样，对人对事的评价又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变化：人人自私，个个丑恶，社会一片黑暗，万事皆无光明，这也不顺眼，那也看不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陷入极端烦恼和痛苦之中。本来，人和人之间存在矛盾，社会在发展中存在弊端，都是正常现象，人类正是通过解决矛盾，克服弊端来显示进步。自己设想没有矛盾、没有弊端，然后埋怨有矛盾、有弊端，这只能说是自寻烦恼。由此我们联想到一个民间故事。这个故事说：一只兔子和一头狮子做邻居。狮子骄傲自大，称王称霸，经常欺压兔子。兔子实在忍不下去了，就想办法报复。它对狮子说：“喂，老大哥，我在一个地方遇见了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动物，它对我说：‘有敢同我比赛的吗？如果有，就叫它来比；如果不敢来比，就得服我管，伺候我！’这真是气死人的大话呀！这家伙真是目空一切呀！”狮子说：“你没有向他提我吗？”兔子回答道：“不提还好，我一提你，它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了许多难听的话，说你当它的跟班，它都不要。”狮子气极了，连忙问：“它在哪里？”于是，兔子把狮子领到山后，远远地指着了一口很深的井说：“它就在那里面。”狮子走到井边，气汹汹地向里面一望，果然有一个同它一模一样的敌人，也在气汹汹地望着它。狮子对敌人吼了一声，敌人也对它吼了一声；狮子把头上的毛扎煞起来，敌人也把头上的毛扎煞起来；狮子张牙舞爪地吓唬敌人，敌人也张牙舞爪地吓唬它。狮子气极了，使尽全身的力气，纵身往井里一扑……狮子是被弱小的兔子打败的吗？不是，是被自己打败的，而且败的那么惨、那么蠢、那么让人瞧不起。狮子为什么自己打败自己？因为它在同一个想象的敌人作战！主观主义者很像这头狮子。当他们责怪和自己头脑中纯而又纯的社会不相符合的现实时；

当他们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同志当敌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时；当他们把商品经济、市场、股票、三资企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引进外资和外国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先进的经验当作资本主义、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时，他们也在同想象的敌人作战。结果也是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自己和自己过不去，自己折腾自己，自己打败自己，自己为自己所做的一切烦恼不已。

观察社会历史、评价是非功过的方法很多，以上四个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的常用的方法。前面三个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实事求是；后面一个是反对主观唯心主义。实事求是和反对主观唯心主义相辅相成。40年代，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中，把教条主义当作党的大敌；90年代，邓小平同志在巡视南方的谈话中，把“左”的思想当作主要防范对象。教条主义、“左”的思想都是主观唯心主义，都极大地危害了我们的事业，都必须铲除。铲除主观唯心主义，靠的就是实事求是。

